

打造「帝國空間」—— 日本帝國之滿洲兵要地志探析 (1872–1904)

林文凱*

19世紀中葉，日本在西方帝國衝擊下被迫開國，並推動明治維新以建設近代化國家。與此同時，日本仿效西方帝國主義推動大陸政策，試圖在東亞擴張勢力範圍。1895年甲午戰爭勝利後，日本躍昇為東亞帝國，面對俄羅斯在滿洲勢力的擴張，於1904年發動日俄戰爭並獲勝，確立在東亞的核心帝國地位。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主要戰場乃在中國東北——滿洲南部的陸海空間，而日本的軍事勝利除了與其陸海軍的近代化建設有關外，也與明治前期日本帝國在滿洲兵要地志的空間學知生產密切相關。

本文擬以明治時期日本滿洲地志的知識生產(1872–1904)為主題，分析其如何在滿洲這個「問題空間」生產兵要地志，藉以奠定戰爭所需的空間學知，並將滿洲逐步打造為其「帝國空間」。討論分成四個部分，首先，探究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帝國的近代軍事改革，如何建置陸海軍參謀機關與駐外武官等制度，並藉以生產滿洲等地之兵要地志；其次，分析日本政界、軍方、外交官員與民間學者，如何共同建置並參與東京地學協會等近代地理學學術機關的空間學知生產，及其在滿洲兵要地志等學知生產上所扮演的角色；其三，討論明治前期日本亞細亞主義團體成員在滿洲兵要地志的生產，以及在滿洲戰地空間情報調查上所扮演的角色；最後，將透過幾類重要的滿洲地志資料的文本分析，探討日本帝國滿洲空間學知生產的主要方式及其知識特徵，並討論其與清朝、英國與俄羅斯帝國等滿洲空間學知之間的交互關聯。

關鍵詞：滿洲地志、空間學知、情報調查、東京地學協會、亞細亞主義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一、前言

19 世紀中期歐美與俄羅斯挾著工業革命的近代化威力，強迫東亞各國開港通商，東亞各地歷史也因此發生鉅變，並彼此緊密連結。最先受到衝擊的清朝，除在鴉片戰爭後被迫開放東南沿海五個港口通商外，其東北、西北、西南與臺灣等邊疆地區則陸續成為帝國主義衝擊的前沿。以本文所關切的東北滿洲地區來說，19 世紀初俄羅斯帝國開始加緊推展在遠東的勢力擴展政策，對於黑龍江流域陸續進行地理與人文調查並擬定軍事佔領計畫，但在俄羅斯中央主張與清朝維持親善派勢力的反對下，並未實際對清朝領土發動侵擾。直到 1850 年代俄羅斯開始三次強行在黑龍江武裝航行，佔領了黑龍江北岸的清朝領土，並要求重新劃分中俄領土界線。

其後俄羅斯趁著第二次英法鴉片戰爭期間，強迫黑龍江將軍與清廷陸續簽署了「璦琿條約」(1858 年 5 月)、「天津條約」(1858 年 6 月)與「北京條約」(1860)，將《尼布楚條約》規定為中國屬地的大興安嶺以南與黑龍江以北廣大領域，加上烏第河未定界地區，及烏蘇里江以東共逾百萬平方公里之領土，歸於俄國所屬。從此俄羅斯的勢力不僅開始深入中國東北，並在獲得海參崴等出海口後，進一步將帝國眼光伸展到日本海兩岸的朝鮮與日本兩國。¹

另一方面，日本面對 19 世紀初以來俄羅斯遠東政策的開展，對其在日本北方海域與島嶼活動本已警覺、憂懼。其後，1853 年日本因美國培里艦隊的壓力被迫開國，並在 1867 年推動明治維新的政經文化改革，轉型為近代民族國家，但也同時學習西方的帝國主義與殖民

¹ 李齊芳，《中俄關係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 163-204。
明驥編著，《中俄關係史》，下冊(臺北：三民書局，2006)，頁 13-81。

地擴張，並發展為東亞後進的國民帝國。日本政府原於 1873 年計畫發動征韓，以迫使其開國，但因內部政變而暫時放棄；隔年則以 1871 年的八瑤灣事件為名發動征臺之役，卻因征臺軍隊受疫病所苦，並擔憂與清朝軍隊正面作戰難以取勝，以及英國干涉等國際外交壓力因素，在臺軍事與佔領行動難以持續，遂與清朝談判議約後撤軍。²

而在朝鮮部分，1860 年代以來陸續受到法國與美國炮艦外交的開港威脅，但仍堅持鎖國政策拒絕開港。不過，在 1875 年日本海軍的江華島砲擊事件後，朝鮮被迫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而開國，並接受原宗主國清朝的勸告，陸續與美國、法國、俄羅斯等國簽訂通商條約；同時，開始引入日本勢力推動近代化改革，但也面臨內部堅持鎖國之攘夷派的反對。其後 1882 年的壬午事變與 1884 年的甲申事變，朝鮮王朝為了鎮壓政變引入清朝的勢力，並壓制親日派對朝政的干涉，日本與清朝圍繞朝鮮控制權的衝突遂持續升高。1894 年朝鮮東學黨農民起義，引發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除朝鮮半島與黃海海戰外，東北的遼東半島也成為雙方的戰場，日本陸海軍大獲全勝。³

隔年 4 月間中日簽訂馬關條約，除賠款外並約定割讓臺灣與遼東半島予日本，但在俄、德、法三國強迫下被迫歸還遼東半島。戰後日本雖強化了對於朝鮮朝政的控制權，但朝鮮君臣為了反制日本而引入俄羅斯的勢力，解散親日內閣建立親俄政府。同一時期，清朝中央為

² 林文凱，〈臺灣與東亞的帝國轉型：牡丹社事件與清帝國秩序的重振與瓦解〉，「牡丹社事件 150 週年國際講座交流會」（屏東：屏東縣政府主辦，2024 年 12 月 12 日）。

³ 有關日本與清朝間圍繞朝鮮宗主權的衝突到日清戰爭爆發的詳細歷史，參見岡本隆司著，陳彥含譯，《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7）。高橋秀直，《日清戰爭への道》（東京：創元社，1995）。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東京：立風書房，1998）。

了壓制日本，也開始聯俄制日，並簽訂中俄密約，除軍事同盟外還同意俄國修築連接西伯利亞鐵道，並貫穿滿洲的東清鐵路。1898年俄羅斯進一步強迫租佔遼東半島上的旅順、大連。1900年義和團之亂引發八國聯軍，俄羅斯出兵後，其軍隊在滿洲滯留多年，拒不撤軍。

1880年代晚期，日本朝野就將朝鮮視為攸關帝國主權安危的利益線區域，因此對於1890年代以來俄羅斯在緊鄰朝鮮的滿洲擴張勢力相當疑懼。1902年與英國結成戰略同盟後，日本在1903年積極與俄羅斯談判，望其從滿洲撤軍並放棄對朝鮮擴張未果，乃在隔年2月發動日俄戰爭，並獲得最後勝利。1905年9月日俄簽訂「樸茨茅斯條約」，並與清朝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日本因此取得俄羅斯在南滿鐵道及其沿線土地之經營權，以及在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而俄羅斯則仍保有之前從清朝取得在北滿地區的鐵路與諸多權益。⁴

本文想探問的是，日本帝國較清朝晚一點受到西方帝國主義衝擊，但同樣在1860年代開始學習西方學知推動近代化，為何能夠在1894年甲午戰爭於清朝北方海域及遼東半島上，擊敗西方各國原先認為會勝利的清朝海陸軍；而後面對已在東北經營數十年，並建成東清鐵道的俄羅斯——這個近代化帝國，日本又為何可在滿洲南部的海陸戰場上取得勝利？

⁴ 二次大戰之前，日本在帝國競爭視野下，對東亞區域秩序構想的演變，包括將朝鮮與滿洲視為攸關帝國安危的地域，將其納入勢力範圍的過程，參見山室信一著，徐興慶譯，《近代日本的東北亞區域秩序構想》（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2001）。有關日俄戰前俄羅斯在東北的勢力擴張過程，參見李齊芳，《中俄關係史》，頁249-312。明驥編著，《中俄關係史》，下冊，頁150-269。從日本大陸政策變動過程分析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過程的歷史，詳見山田朗，《世界史の中の日露戦争》（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和田春樹著，易愛華、張劍翻譯，《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上下冊）（北京：三聯書店，2018）。

本文認為，日本帝國之所以能夠贏得兩次戰爭，並逐步將中國東北打造為日本的「帝國空間」，主要與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對「帝國學知」的學習與建構有關。晚近日本史與殖民地史研究指出，19世紀後期以來，日本的民族國家建構與殖民地擴張是同時展開且交錯發展的過程，並在民族國家建立與殖民地統治所需的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等諸種制度建構過程中，來自西方的近代化學知，也就是所謂「帝國學知」的移植、轉化與運用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這些學知的建構、發展過程中，近代化調查活動亦扮演關鍵角色。⁵

日本帝國對外戰爭的勝利，固然與明治維新以來陸海軍的軍事化建設密切相關，但日清與日俄戰爭的勝利，亦與其對於滿洲戰場兵要地志的空間學知的掌握密切相關。如同日本學者源昌久等人有關日本帝國的中國兵要地志研究，所謂兵要地志，是依據作戰需要，對特定地域之自然地理條件、社會因素及其對作戰行動之影響，從事綜合記述和評估的一種軍事資料。它提供部隊有關地形、氣象、經濟條件、社會狀況等圖表與統計資料，為軍事指揮與參謀人員理解與判斷戰區地理條件、規劃作戰計畫和實施軍事行動的重要依據。兵要地志的製作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蒐集既有文獻資料編纂而成的文書、第二類是透過現地調查生產而成的調查報告書、第三類則是前兩類資料合成的地志資料。而兵要地志的生產者以陸海軍參謀機關的軍人為主，還有潛藏在國外的外交與商社機關的軍事情報調查人員。⁶

⁵ 參見山室信一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学知：第八卷 空間形成と世界認識》（東京：岩波書店，2006）。末廣昭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学知：第六卷 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

⁶ 源昌久，〈日本の兵要地誌に関する一研究：中国地域を中心に〉，收入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地図作製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外邦図」へのアプローチ》（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09），頁256-298。沈克尼，《侵華日軍兵要地志揭秘：100年來日本對中國的戰場調查》（北京：三聯書店，

有關日本「滿洲地志」空間學知之分析研究，⁷有如前述源昌久等人有關日本的中國兵要地志之研究，然而，既有研究多以昭和時期資料之整理為主，缺少明治初期的分析，且缺乏空間學知生產的知識史分析。除此之外，與本文分析主題相關之研究尚可歸納為以下四類，首先，是日本學者山室信一對帝國學知中的「空間學知」之研究，他曾討論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帝國在民族國家與殖民地空間的擴展過程中，如何陸續將朝鮮、滿洲與整個中國甚至南洋地區視為國家安全防衛所需的「問題空間」，進而在這些區域展開兵要地志調查，以生產進行軍事征伐所需的陸地與海洋空間學知；另一方面，也分析軍事征伐勝利後，日本帝國為了將殖民地轉化為穩固的「經營空間」，又如何透過另類滿洲地志的製作，生產殖民地近代化政治與經濟經營所需的空間學知。⁸

其次，日本陸軍針對中國軍事情報調查為主題的研究，如關誠、大澤博明、佐藤守男等日本學者，以及許金生、楊典錕等中、臺學者的軍事情報史研究。⁹另外，針對日本情報調查中重要的陸地與海洋兵

2021)，頁 67。

⁷ 「滿洲地志」一詞，中文或日文有時亦寫為「滿洲地誌」，其有時為特定書名、有時為專有或一般名詞，本文以下在指涉中日文書名時，將依其原文寫為《滿洲地志》或《滿洲地誌》，在作為專有名詞討論、指涉時將加引號寫為「滿洲地志」，而在作為一般名詞時寫為滿洲地志。

⁸ 山室信一，〈空間アジアをめぐる認識の拡張と変容〉，收入青木保等編，《アジア新世紀 1 空間：アジアへの問い》（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 29-56。山室信一，〈文化相渉活動としての軍事調査と植民地経営〉，《人文学報》，91（京都，2004），頁 227-249。

⁹ 關誠，《日清開戦前夜における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明治前期の軍事情報活動と外交政策》（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大澤博明，《陸軍参謀川上操六：日清戦争の作戦指導者》（東京：吉川弘文館，2019）。佐藤守男，《情報戦争と参謀本部：日露戦争と辛亥革命》（東京：芙蓉書房，2011）。許金生，《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 1868-193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楊典錕，〈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軍事

志地圖，尤其有關中國外邦圖的專門分析，主要有日本地理學者小林茂等人的一系列研究。¹⁰相對於山室信一概念性與理論性的知識史研究，這些研究對日本在甲午與日俄戰爭中的情報調查與地圖生產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實證分析。

第三類有關日本地學史與東京地學協會等學術機構的研究，如石田龍次郎、土井正明、安岡昭男等學者，討論了明治初期以來日本如何從西歐引進地學(地理學、地質學)等知識，不僅在東京大學等處推進地學，並在初等與中等教育引進地學教育，以培養具備近代地學知識並能從事兵要地志生產之人才。同時，也探討了明治初期的渡邊洪基(1848-1901)、榎本武揚(1836-1908)、長岡護美(1842-1906)等人如何參照維也納皇家地學會與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在 1879 年籌設東京地學協會，藉以傳播地學知識並鼓勵國人海外雄飛，從事海外探險與地志調查活動。¹¹

最後一類，是以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團體與人物為主的中日外交交涉與文化交流史研究。此類研究指出，黑龍會、興亞會、東邦協會及東亞同文會等明治時期日本亞細亞主義團體有關滿洲學知的調查與生產

顧問・教官並びに特務機関の研究(一八九八~一九四五)》(東京：東京大学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論文，2008)。

¹⁰ 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地図作製と太平洋地域：「外邦図」へのアプローチ》。小林茂，《外邦図：帝国日本のアジア地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1)。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海外地理情報収集と初期外邦図》(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7)。另外作為小林茂研究基礎的先行研究，包括村上勝彦，〈解説隣邦軍事密偵と兵要地誌〉，收入陸軍參謀本部編，《朝鮮地誌略 1》(東京：龍溪書舎，1981)，頁 1-48。高木菊三郎著，藤原彰編，《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

¹¹ 石田龍次郎，《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地理学の成立》(東京：大明堂，1984)。土井正民著，張弛、何往譯，《日本近代地學思想史》(北京：地質出版社，1990)。安岡昭男，〈初期の東京地学協会と軍人〉，《政治經濟史学》，400(東京，1999)，頁 149-162。

活動，分析這些以東亞同文傳統為由，反對歐洲對亞洲的侵略，並主張中日親善合作的亞細亞主義團體及人物，與日本帝國的軍事征伐，以及殖民地經營的學知生產間之複雜關聯。重要研究包括日本學界的安岡昭男、佐藤三郎、狹間直樹、山室信一與臺灣學者黃福慶、陳豐祥，以及中國學者翟新、趙軍等有關日本大陸政策及亞細亞主義之探討。¹²

本文將綜合上述各類研究，分析明治前期(1872-1904)日本帝國如何在滿洲這個「問題空間」生產兵要地志，藉以建構戰爭所需的空間學知，並將滿洲逐步打造為其「帝國空間」。全文討論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探究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近代軍事制度改革，如何建置陸海軍參謀機關與駐外武官等制度，並藉以生產滿洲等地的兵要地志；其次，分析日本政界、軍方、外交官員與民間學者，如何共同建置並參與東京地學協會等近代地理學學術機關的空間學知生產，及其在滿洲兵要地志等學知生產上扮演的角色；其三，探討明治前期日本亞細亞主義團體成員在滿洲兵要地志的生產，以及甲午及日俄戰爭時在滿洲戰地空間情報調查上的角色；最後，將透過幾類重要的滿洲地志資料的文本分析，探討日本帝國滿洲空間學知生產的主要方式及其知識特徵，並討論其與清朝、英國與俄羅斯帝國等滿洲空間學知之間的交互關聯。

¹² 安岡昭男著，胡連成譯，《明治前期日中關係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佐藤三郎著，徐靖波、李建云譯，《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山室信一，《アジアびとの風姿：環地方学の試み》(京都：人文書院，2017)。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陳豐祥，〈亞細亞主義與荒尾精——甲午戰前日本大陸浪人的一個典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臺北，1994)，頁227-265。翟新，《東亞同文會と中国：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理念とその実践》(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1)。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東京：亜紀書房，1997)。

二、日本陸海軍參謀機關與相關機構的滿洲兵要地志生產

在討論日本陸海軍對滿洲地志相關情事的調查與編纂之前，因其參謀及測量機關主導軍事戰略擬定與兵要地志情報蒐集，須先說明其沿革。

（一）陸軍參謀與陸地測量機關

日本在 1869 年設立兵部省主管陸海軍的建設，並在 1871 年 7 月設置陸軍參謀局，負責掌管「軍機密謀的規劃、地圖政誌的編輯及間諜情報事務」，由當時的兵部大輔山縣有朋(1838-1922，有「日本陸軍之父」稱號)擔任局長。1872 年 2 月兵部省廢除，新設陸軍省與海軍省，陸海軍務開始分立，原兵部省陸軍參謀局改為陸軍省參謀局繼續存在；1873 年 4 月參謀局改稱第六局，由陸軍少將鳥尾小彌太(1848-1905)擔任局長。不過，隔年 2 月廢除第六局再度設置參謀局，並將其規模大幅擴張，再度由時任近衛都督的陸軍中將山縣有朋兼任參謀局長。此時期參謀局內設置七課：總務課、亞細亞兵制課、歐美兵制課、兵史課、地圖政誌課、測量課、文庫課。

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陸軍原以法國陸軍體制為學習對象，但普法戰爭普魯士戰勝，德意志帝國崛起後，1878 年山縣有朋等陸軍高層接受德國留學歸來的桂太郎(1848-1913)之建議，將陸軍各項體制改為德國模式，乃受到德國軍事學中軍政與軍令分立制度的影響，將參謀局從陸軍省獨立改稱參謀本部，並擴大其建置。此一時期參謀本部設置部長一人、次長一人，下設有管東局(負責日本東部與樺太、滿洲、堪察加、

西伯利亞等地戰略規劃)、管西局(負責日本中西部與朝鮮、清朝沿海等地的戰略規劃)、總務課、地圖課、編纂課、翻譯課、測量課、文庫課等部門。首任參謀本部長仍為山縣有朋、次長大山巖(1842-1916)。¹³

兵部省參謀局設立後一開始僅以日本全國、琉球及樺太島等國內的地圖測繪為中心，有關軍事的情報蒐集活動也僅限定在國內的重大治安上。外國情報方面，最初不是在參謀局底下展開活動，而是主張外征的明治政府參議西鄉隆盛(1828-1877)個人主導下為之。1872年間，日朝之間因朝鮮堅持與清朝的傳統宗藩關係，拒絕建立正式國交而關係緊張，當時擔任參議並兼任陸軍元帥與近衛都督的西鄉隆盛提議征韓，並有可能與朝鮮宗主國清朝發生衝突的設想。西鄉乃在該年8月間派遣北村重賴等三名陸軍軍官陪同外務大丞花房義質(1842-1917)前往朝鮮交涉，並暗中探查兵要地志情報；同時，也秘密派遣前陸軍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滿洲方面查探軍事情報。這可說是日本軍方最初對於外國的軍事偵察活動。但隔年1873年9月間出國參訪快兩年的岩倉使節團成員歸國，這些維新重臣主張內政優先，發動政變，外征派西鄉隆盛等人被逐出政府，征韓之議終止。

另一方面，1871年12月間琉球貢民遭臺灣南部原住民殺害的八瑤灣事件消息，於隔年6月倖存者回到琉球後傳至明治政府，政府內部出兵懲罰聲浪高漲，因此在該年11月間，西鄉隆盛派遣陸軍少佐樺山資紀(1837-1922)等人前往臺灣與華南進行兵要地志情報的探查。而在1873年10月間西鄉隆盛下野後，明治政府為了安撫主張征韓的薩摩派等不滿軍人，決定以懲罰臺灣原住民殺害「日本國人」(實為琉球人)為名推動臺灣出兵。除了樺山資紀等人外，當時負責陸軍參謀業務的第六局，也在1873年底派遣將校分別前往滿洲、華北與臺灣進行軍事情報探查。

¹³ 以上兩段沿革說明，整理自參謀本部編，《參謀本部歷史草案(一~三)：明治四年~十三年》(東京：參謀本部，1902)，頁18-73。

此可視為日本陸軍參謀部門首次進行具組織性的對外情報調查。

尤需注意，1875年日本在清朝的公使館設立後，陸軍接納參謀局諜報部提理桂太郎之提案，仿效歐美制度，開始派遣陸軍將校以公使附屬武官的身分秘密從事軍事情報調查，這成為日本對外邦從事制度性情報調查的開端。而隨著1878年參謀本部設立後，該機關的組織擴大，明治時期日本對於俄羅斯、朝鮮與清朝等重要外邦的制度性軍事情報偵察體制也因此擴大與制度化。¹⁴

而在甲午戰爭之前，隨著朝鮮壬午事變與甲申事變的爆發，日本與清朝之間圍繞朝鮮宗主權的爭奪，還有清朝北洋海軍建設對日本的威脅，加劇了日本與清朝之間的軍事外交衝突；另一方面，俄羅斯帝國1870年代在遠東地區(滿洲、朝鮮與日本北方海域)的勢力擴張，以及1891年西伯利亞鐵道的動工，加劇了日本對於俄羅斯帝國擴張的疑懼，並擔憂朝鮮與滿洲淪為俄羅斯支配區域，危害日本國家安全。這些圍繞東北亞國際關係變化的重大因素，進一步促成日本對於俄羅斯、朝鮮與滿洲等地情報偵察需求的提升。¹⁵以本文關切的滿洲地志學知來說，日本參謀本部即在1884年開始編纂全套《中國地誌》，並於1889年完成該套第15卷上冊之首本《滿洲地誌》。¹⁶

在甲午戰後，清帝國陸續模仿日本學知，推動各種新政，並有大量學生留學日本。而在日本陸軍的情報體制方面，除了之前的駐外武

¹⁴ 村上勝彦〈解説隣邦軍事密偵と兵要地誌〉，頁1-12。闕誠，《日清開戰前夜における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頁23-41。

¹⁵ 村上勝彦，〈解説隣邦軍事密偵と兵要地誌〉，頁13-41。闕誠，《日清開戰前夜における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頁119-121、127-128、146-180、273-285。

¹⁶ 參見參謀本部編纂課編輯，參謀本部第二局校正，《支那地誌 卷15 上滿洲部》(東京：參謀本部，1889)。有關這本滿洲地志的學知內涵參見以下分析。

官與秘密情報人員的派遣外，日本帝國也配合清朝的軍事近代化新政，積極推動清朝中央與各省接受日本軍事學堂教習之派遣，這些陸軍現役或者退役軍人教習除了協助傳播近代軍事學知外，通常兼任參謀本部賦予的情報刺探任務，並努力建立日本軍方與清朝中央、各省要員之間的軍事合作與政治親善關係。¹⁷這些關係對於日俄戰爭前夕，日本在滿洲戰場上有關俄羅斯軍方的戰爭情報收集至關重要。

而在日本陸軍滿洲地志情報建置上，尚有一重要機關需特別討論，即負責兵要地志建構中重要一環——外邦圖(外國地圖)繪製的陸地測量機關。日本陸軍最初是在 1872 年間，於法國軍事顧問團的指導下開始學習兵要地圖的製作，西南戰爭後在參謀本部內設置地圖課與測量課，並開始主導日本國內地圖的製作。1884 年開始設置參謀本部測量局，1888 年測量局從參謀本部所屬一局升格為陸地測量部，直屬參謀本部長管轄，負責外邦圖的製作。陸軍測量機關的外邦圖繪製最初是由複製與整理歐美所製亞洲地圖開始，其後才陸續進展到派遣人員進行實地測繪。¹⁸

(二) 海軍參謀與水路測量機關

接著，討論日本海軍對於清朝，尤其滿洲相關的海軍戰略規劃與海洋地志情報的蒐集建構，這類情報的生產分別由日本海軍參謀機關與水路測量機關負責。

17 楊典錕，〈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軍事顧問・教官並びに特務機関の研究(一八九八~一九四五)〉，頁 1-48。

18 陸地測量部編，《陸地測量部沿革誌 第 1 至 5 編》(東京：陸地測量部，1922)。陸地測量部編，《外邦測量史沿革草稿》(東京：陸地測量部，1939)。高木菊三郎著，藤原彰編，《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海外地理情報収集と初期外邦図》。

1871 到 1884 年間日本軍事建設為「陸主海從」階段，海軍艦艇尚在購買與自建的整備期，對外征伐尚非主要的軍事規劃，海軍的軍政與軍令部門尚未分化，海軍參謀作業需求也還不多，尚未設立獨立之海軍參謀機關。但 1880 年代初期日清關係日益惡化，日本不僅有加緊建設海軍的壓力，並將對外戰爭威脅之主要對象由俄羅斯轉向清朝。¹⁹因此 1884 年作為海軍參謀部門的海軍軍事部成立，且為統合陸海軍的戰略規劃與合作，曾在 1886 到 1889 年間將陸海軍參謀機關合併在參謀本部之下。但 1889 年 3 月陸海軍參謀機關再次分立，不過與陸軍的軍政軍令分立不同的是，海軍參謀部最初仍隸屬於軍政部門的海軍省，直到 1893 年方從海軍省獨立出去，改稱為海軍軍令部，進一步強化海軍參謀機關的戰略規劃作業能力。

另一方面，有關海軍水路機關，在幕府末期日本就設置長崎海軍傳習所，向歐美學習水路測量學，並借用外國船艦，初步從事日本海域的水路測量。1869 年兵部省設立後，在兵部省御用掛的機構下，繼續推進國內水路並擴及北海道沿岸的測量事業。1871 年兵部省內下設陸軍部及海軍部後，在海軍部下成立了水路局。1872 年 4 月兵部省廢除，分設陸軍省、海軍省後，水路局繼續歸海軍省管轄。其後伴隨海軍機關編制的改革，水路局改名為水路寮(1872 年 10 月)、後又復名為水路局(1876 年 8 月)，其下的編制機關與業務也陸續稍有變動，並開始推動包括朝鮮、滿洲等地之海外水路測量與出版作業。

¹⁹ 1860 年代以來面對俄羅斯在遠東的擴張，日本首要擔心的敵對勢力是俄羅斯，但 1874 年臺灣出兵與江華島事件以來，日清關係日益緊張。而 1882 年朝鮮壬午事變、1884 年甲申事變清朝外派的淮軍部隊挫敗了日本在朝鮮的軍政勢力；同時 1886 與 1891 年建設中的北洋海軍艦隊訪問日本引發的兩次外交事件，更加深了日本對於清朝新建海軍的忌憚。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參謀本部》(東京：中央公論社，1986)，頁 35-57。

1885年伴隨日本中央行政體制改為內閣制，水路局再改制為海軍水路部，但伴隨海軍參謀機關的設立，1889年水路部不再直屬於海軍大臣管轄，轉而隸屬於其下屬之海軍參謀本部長管轄。而1893年海軍參謀部脫離海軍省，並改組為獨立的海軍軍令部後，水路部改隸屬於海軍軍令部長管轄。但1897年水路部從海軍參謀機關脫離，再次歸為軍政部門海軍省的直轄機關。²⁰

三、東京地學協會等近代學術機構的滿洲兵要地志生產

明治初期，日本駐奧地利公使館書記官渡邊洪基任職於維也納期間，成為了維也納地理學協會的會員，深感日本也需要類似的學術協會，藉以推動日本近代地理學知的生產。渡邊洪基歸國後，在1878年與榎本武揚(前駐俄羅斯公使)、花房義質(代理駐朝鮮公使)商議東京地學協會的設立事宜。恰巧此時，曾在英國長期留學並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的鍋島直大(1846-1921, 幕末佐賀藩最後一代藩主)，以及長期在美國與英國留學的長岡護美(熊本藩最後一代藩主的異母弟)相繼歸國，皆贊同此一計畫。這五人互相商議，又召集了十餘位志同道合者，乃在翌年2月，由渡

²⁰ 應注意的是，如同明治初期日本曾被迫接受外國領事裁判權與關稅，無法自主一樣，日本水路機關成立最初幾年，遭外國以水路航行安全為由，強迫接受由外國人代為測量日本水路。直到水路機關確立了自身的組織、人員與能力後，1881年方才得以拒絕外國的干預，擬定12年的全國海岸測量計畫，並逐步展開國外水路測繪作業。以上有關海軍參謀機關與水路機關的沿革，參見海軍省編，《海軍制度沿革 卷二》(東京：海軍大臣官房，1941)。水路部編，《水路部沿革史：明治2-18年》(東京：水路部，1916)。水路部編，《水路部沿革史：自明治19年至大正15年》(東京：水路部，1935)。

邊洪基、鍋島直大、長岡護美、桂太郎(陸軍少佐、駐德公使館武官)、北澤正誠(歷史地理學者)五人發起，在上野與十六位同志共同商議協會的設立。同年3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承諾擔任協會的會長(當時稱為社長)，於是二十餘位發起人齊聚學習院，正式議決成立該協會。

(一) 東京地學協會的設立目的、組成成員與陸海軍關聯

協會成立當日議決的「東京地學協會規則」共九條，第一條，本會設立目的：「第一、凡有關於地學，以及涉及經濟、軍務與其他方面有益之事件的發現，若為本會所見聞者，應隨時以簡便方式編纂出版，以供社會研究之用，並通知公眾。第二、凡捐贈給本社之關於內外古今地學的書籍、航海日記、紀行等各種文獻、儀器、地圖、海圖、地志及其他探險紀錄，以及個人所藏之有益資料，皆應彙集設置一座文庫，以備查閱之用。第三、凡欲從事探險旅行，或其他旅行者有意進行地學方面之探察者，若欲經由本會協助行事者，應提交報告。內容包括：需前往之地區、前往該地最便利之方法、所欲深入探查之事物、特別希望採集之博物學標本及對地學進步有助之備忘心得。第四、就地學之事，得與各國之地學協會、研究地學之外國人士，以及分布於國內外之本國學者進行書信往來。第五、對於對地學之進步或發明有所貢獻者，應頒予獎牌或其他相應之獎勵，以資獎勵。」

第二條，係關於「學科劃分」，明定各科之學術依據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分類方式。其劃分如下四科：一、本科：地球之體積與形狀、地球之運動與本質、自天體所受之感應，即研究地球的基本物理性質，如大小、形狀、自轉與公轉等運動、內部本質，以及受到太陽或其他天體影響的現象。二、形質科：地球自然區劃與地質、山脈荒原沙漠礦山礦石、動植物之解說、海洋湖泊河川泉源、潮汐水流等水理學事

項、氣候風雨天氣季節、火山地震等現象。即包含地形地貌、自然資源、動植物、氣象水文現象等，是屬於自然地理學的範疇。三、特科：地球之古今歷史、人種語言之播遷、州郡府邑之名稱由來與變革、天文與地理上的經緯度、磁針偏角與傾角等磁力現象、高低距離之測量、各國與各民族所居之地的面積與比例。即聚焦於人文與科學的綜合領域，如歷史地理、人種與語言分布、地名變遷、天文測量與磁學現象等。四、政略科：人口與民族之分類與統計、土地之人工區劃與耕作產物、貿易製造漁獵、政體風俗法律政略、溝渠道路橋樑水車、市場、宗教教育軍力藝術。即屬於人文地理與社會地理範疇，探討人類活動與空間分布，包括政治經濟制度、基礎設施、宗教教育與軍事。²¹

同年4月18日東京地學協會正式成立，當天除社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外，並選出副社長：榎本武揚、鍋島直大；議員：鍋島直大、渡邊洪基、榎本武揚、赤松則良(1841-1920)、桂太郎、長岡護美、佐野常民(1823-1902)、福地源一郎(1841-1906)、山田顯義(1844-1892)、塚本明毅(1833-1885)、福澤諭吉(1835-1901)、北澤正誠；幹事：渡邊洪基、桂太郎、北澤正誠、長岡護美。其後福澤諭吉在8月辭退議員，由柳檣悅(1832-1891)繼任。而在4月26日第一次例會時，北白川宮社長在演說中特別強調地學的用處，在國內包括勸農、勸工、勸商、運輸、政治、國防；對外方面，為航海、通商、戰爭，即「無論是謀求國內的富強，還是對外伸張國威，無一不取資於地學」。

東京地學協會為促進日本地學知識的推廣傳播，自創立之年起開始發行機關刊物《東京地學協會報告》(以月刊為原則)，內容包括協會記錄事項、探訪紀行、例會講演的紀錄，以及地圖、圖畫、與受贈書目等，每年另行發行一次年會記錄(即年報)。1892年東京地學協會與東京

²¹ 〈本會創立記事〉，《東京地學協會報告》，1：1(東京，1879)，頁1-10。

大學理學部地質科師生及農商務省地質局職員等組成的另一個學會「地學會」合併，並承接發行該學會的學會誌《地學雜誌》。不過，《東京地學協會報告》仍以季刊形式繼續發行，最終於 1897 年 7 月正式停刊，僅繼續出版《地學雜誌》。另外，東京地學協會持續與國內外諸多團體與學會進行出版刊物交換，同時協會所設之「文庫」則透過購買與捐贈，收藏地學相關書籍、地圖、海圖、模型、實測圖、儀器等，並提供社員借閱。²²

該會創立時的社員數，包括社長在內共 96 名。其中皇族 2 名，華族 20 名，軍人 29 名(不含皇族，但包括陸軍與海軍的卿職)，參議與卿共 8 名，官吏 33 名，民間人士 6 名(其中有 2 名為報社社長，另有其他人士)。作為社員的有內務省地理局的御用掛官員荒井郁之助(1836-1909)、塚本明毅(1833-1885)、河田巖(1842-1920)，及太政官修史館的一等編修官重野安繹(1827-1910)、川田剛(1830-1896)、巖谷修(1834-1905)等人，北澤正誠則於翌年成為外務省御用掛官員，並兼任記錄局編纂課長。也有不少與地理學相關的專門人員陸續加入，如編纂《大日本交通史》(原名*駒志稿*)的日本驛遞局御用掛官員青江秀(1834-1890)，係在創立後隔年成為社員。此外，有對地學知識感興趣的上流社會貴族紳士加入該會。最後，還有英國、德國、俄羅斯與清朝的外交官與公使館武官加入該會。

值得注意的是，東京地學協會創立時，社員中包含貴族出身的陸海軍將校共有 31 名，陸軍 18 名：如(中將)大山巖、(中佐)北白川宮能久

²² 以上有關東京地學協會的成立沿革，參見大井上義近，〈東京地学協会の沿革〉，《地学雜誌》，63(東京，1954)，頁 1-11。石田龍次郎，〈東京地学協会編年史稿〉，《地学雜誌》，78：3(東京，1969)，頁 83-123；石田龍次郎，〈東京地学協会編年史稿・補遺〉，《地学雜誌》，80：1(東京，1971)，頁 36-45。有關該協會兩個機關刊物《東京地學協會報告》、《地学雜誌》在日本近代地理學學知上的重要意義，參見石田龍次郎，《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地理学の成立》，頁 87-266。

親王、(中佐)桂太郎、(少佐)梶山鼎介(1848-1933)、(大尉)島弘毅等人。²³海軍 13 名：如(中將)榎本武揚、(大佐)柳樞悅、(大尉)黑岡帶刀、(大尉)曾根俊虎(1847-1910)等人；²⁴另有陸軍會計軍吏、海軍六等出仕、海軍大祕書 3 名。其後，並有以下陸海軍將校繼續加入，陸軍 7 名：如(大將)有栖川宮熾仁親王(1835-1895)、(少將)曾我祐準(1844-1935)、(中尉)福島安正(1852-1919)等人。²⁵海軍 7 名：如(中將)有地品之允(1843-1919)、(中尉)磯野健等人。²⁶另外，陸軍一等軍醫正石黑忠憲(1845-1941)、海軍六等出仕近藤真琴(1831-1886)也都加入(按以上將校階級為入會時之軍銜)。

而在這些軍人中，包括前述創設、改革陸軍參謀本部組織的桂太郎，曾任參謀本部長與次長的大山巖、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曾我祐準等人，還有創設、主導海軍參謀事務的榎本武揚、中牟田倉之助、伊藤雋吉、有地品之允、黑岡帶刀等人，其他陸軍將校也多參與了陸海軍參謀機關的勤務。如前所述海軍與陸軍參謀部門正是日本軍方主管國內外兵要地志知識生產的部門，而以上桂太郎等參謀將校之所以積極參與東京地學協會，正是希望藉由這一學術公共領域強化日本地學知識的普及，並藉該領域的交流協助推動兵要地志的學知生產。

²³ 陸軍將校另有(中將)谷干城(1837-1911)、野津鎮雄(1835-1880)、三浦梧樓(1847-1926)；(少將)東伏見宮嘉彰親王(1846-1903)、揖斐章(1844-1881)、小澤武雄(1844-1926)、三好重臣(1840-1900)；(大佐)淺井道博、滋野清彥、堀江芳介(1845-1902)；(中佐)牧野毅(1845-1894)等人。

²⁴ 海軍將校另有(中將)中牟田倉之助(1837-1916)；(少將)赤松則良、林清康(1843-1909)；(大佐)伊藤雋吉(1840-1921)、伴鉄太郎(1825-1902)、福島敬典(1839-1896)；(中佐)澤野種鏡；(少佐)今井兼輔、末川久敬等人。

²⁵ 另有(少將)井田讓(1838-1889)、原田一道(1830-1910)；(大佐)保科正敬；(中佐)伏見宮貞愛親王等陸軍將校。

²⁶ 另有(少將)真木長義(1836-1917)、(大佐)本山漸、(中佐)遠武秀行、(少佐)中村雄飛、(大尉)本宿宅命等海軍將校。

(二) 東京地學協會的海外探險、水路調查與滿洲地志生產

東京地學協會為了鼓勵日本的海外探險與水路調查，在協會創立後不久，就舉辦海軍軍艦清輝號遠航歸國的歡迎紀念活動。該軍艦 1878 年 1 月從品川出海遠航歐洲，歷經 27,000 海里於 1879 年 4 月 18 日在橫濱入港歸國，5 月 31 日協會在上野公園設宴招待遠航海軍官兵。同年瑞典汽船「維加號」環繞北冰洋航行一週，於 9 月駛入橫濱港，東京地學協會也與德意志東亞協會(OAG)、日本亞細亞協會等於 9 月 15 日在日本工部大學校舉辦歡迎會招待該探險隊，三個團體共有 130 餘人參加，並頒布「有功於地學」之紀念獎牌給探險隊長，即知名地質學家、礦物學家及北極探險家諾登舍爾德(Nils Adolf Erik Nordenskiöld, 1832–1901)。

此外 1882 年 9 月協會議員、海軍創立元勳佐野常民，在例會演說中發表「故伊能忠敬翁事蹟」演說，表彰日本江戶時代的地圖測繪家伊能忠敬(1745–1818)，透過日本蘭學學習西方天文學與地理測量，並在 1821 年繪製完成日本第一張科學方式製作的全國地圖《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佐野常民在演說中倡議募款為伊能忠敬建設記功碑，該紀念碑後在 1889 年建成，並舉行揭幕式表彰其對日本近代地學研究之功績。

另外，參與東京地學協會的海軍將校中還包括水路學專家，即時任海軍省水路局長的柳樞悅、與水路局觀象課長磯野健。兩人為了推動日本水路學的傳播發展，在東京地學協會的贊助支持下，於 1888 年 3 月將黑岡帶刀大尉 1880 年自英國帶回的英國海軍探測指南《學海探究之指針》一書翻譯完成，由海軍水路部出版(柳樞悅作序，肝付兼行[1853–1922]編輯)。這本書共十五篇，其中「天文」與「潮汐」部分由肝付翻譯、「水路」與「地表磁氣」由測量助手翻譯說明，其餘篇章則由東

京地學協會委託專門人士翻譯，內容包含人種、醫學、統計等項目(地震篇由荒井郁之助翻譯)。此書另有追補篇於 1889 年出版，後合編為一冊，成為海軍軍官必備的航行水路工具書，並屢次再版。²⁷

應說明的是，東京地學協會成立後，之所以能夠迅速推進日本近代地學相關調查與研究活動的開展，除了與幕府晚期日本在蘭學刺激下對於西方近代地學的初步引入有關外，²⁸主要與明治前期西洋近代地學的全面導入有密切關聯。

明治前期西洋地學整體導入日本並逐步本土化之歷史過程，可分為三個面向，首先有關日本官方與學術機構及社會各界引入西洋近代地學的過程：包括日本官方國土調查研究機關之設立(主要有內務省戶籍地圖掛/地理寮/地理局)；各種地學調查事業的展開(包括工部省測量司/陸軍省陸地測量部/農商務省地質調查所/內務省地理局觀測課/海軍省水路部等機構的地圖作成/地質調查/氣象觀測/沿岸測量作業)；學術體制之建立與整備(包括專門教育機關如修學實驗所、開拓使仮學校專門科、工學寮/工學校、大學南校理科、東京大學理學部)；地學相關協會的創建(包括東京地學協會、工部大學校工學會、日本地震學會、東京氣象學會、博物友會、地學會、東京地質學會)；以及日本對地學相關國際會議的參與、及相關博覽會與博物館之籌設。²⁹

²⁷ 以上三段討論，參見安岡昭男，〈初期の東京地学協会と軍人〉，頁 159-160。

²⁸ 有關幕府時期日本透過蘭學間接吸收西洋科學，並在幕末逐步成為維新志士擴大繼受洋學的媒介，過程參見 G. B. Sansom 著，金井圓等譯，《西歐世界と日本(下冊)》(東京：筑摩書房，1966)，頁 213-335。佐藤昌介，《洋学史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社，1980)；佐藤昌介，《洋学史論考》(京都：思文閣，1993)。

²⁹ 參見日本地学史編纂委員会、東京地学協会，〈西洋地学の導入(明治元年～明治 24 年)その 1：「日本地学史」稿抄〉，《地学雑誌》，101：2(東京，1992)，頁 133-150。

其次，明治時期日本之所以能夠將西洋近代地學完整引入本國，主要透過明治時期以來小學、中學與大學各級教育中地理學教育之建置而達成，這包括各級學制中地理學、地質學與礦物學等地學教育的推展。³⁰最後，明治初期日本在大量外國顧問與本國國外留學者的協助下，迅速推動近代地學的行政與教育建置後，³¹在約十年內就快速培養了本土化的地學教學與研究人才，並迅速於地質學、礦物學、岩石學、應用地質學、火山學、地震學、大地測量學(地球物理學)、氣象學等領域達成教學與研究的本土化。³²

前面已說明地理空間學知生產中陸海軍將校的重要關聯，接著以東京地學協會創設發想者渡邊洪基的經歷，說明明治初期日本地理空間學知的創設過程中，外務省、工部省等外交與工程行政主管機關，與東京大學、東京地學協會等高等教育與學術機構人員網絡密切相關。渡邊洪基，少時在福井藩醫學校學習蘭方醫學，後在江戶開成所(東京帝國大學前身之一)與福澤諭吉創設的蘭學英學塾(慶應義塾大學前身)學習英學，並師事福澤諭吉，之後在幕府醫學所任職。戊辰戰爭爆發後從幕府醫學所離職，改在會津藩教授英學並於米澤藩創設洋學校。

³⁰ 參見日本地学史編纂委員会、東京地学協会，〈西洋地学の導入(明治元年～明治24年)その2：「日本地学史」稿抄〉，《地学雜誌》102：7(東京，1993)，頁878-889。

³¹ 有關明治前期日本透過外國顧問與海外留學生引進西方學知，建立近代行政與學術教育體系過程，參見梅溪昇，《お雇い外国人の研究(上、下卷)》(東京：青史出版，2010)。金井圓，《対外交渉史の研究：開国期の東西文化交流》(東京：有隣堂，1988)。

³² 參見日本地学史編纂委員会、東京地学協会，〈西洋地学の導入(明治元年～明治24年)その3：「日本地学史」稿抄〉，《地学雜誌》103：2(東京，1994)，頁166-185。石田龍次郎，《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地理学の成立》，頁267-300。土井正民著，張弛、何往譯，《日本近代地學思想史》，頁92-157。

明治維新後，渡邊洪基先後在「大學校」(文部省的前身)、外務省與工部省任官，其後擔任東京府知事、「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原名)的初代總長、文官試驗局局長、駐奧地利與瑞士公使、眾議院議員等職。除主導創設東京地學協會外，並參與創設了亞細亞主義先驅團體興亞會、東京統計學會(日本統計協會前身之一)、日本國家學會、日本建築學會、工業化學會(日本化學會前身之一)等團體，並擔任各會之會長，也參與了工手學校(工部大學校的前身)、大倉商業學校(東京經濟大學的前身)之創設。³³

接下來，透過《東京地學協會報告》與《地學雜誌》兩份刊物的內容，進一步討論東京地學協會等近代學術機構對於日本帝國滿洲兵要地志知識生產的作用。首先，東京地學協會在 1892 年與地學會合併之前，因為以海外探險調查及地學知識的傳播啟蒙為成立目的，其機關刊物《東京地學協會報告》主要以海外地學知識為刊登主體，日本本國的地志報告相對較少。而海外地志調查報告中，則又以鄰近日本且為明治時期大陸政策主要對象的俄羅斯西伯利亞、中國東北滿洲及朝鮮地域，以及通往這些地域涵蓋滿洲周遭水域的東北亞水路為主體。在這些滿洲地域的地志報告中，除了部分參照中國史料的滿洲歷史地志外，有大量滿洲兵要地志的實地調查報告，且很多調查報告也

³³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將原幕府直屬的昌平坂學問所、開成所、醫學所統合建立大學校。後因國儒學與西洋學之爭，於 1871 年廢除原教授國儒學的大學本校(原昌平坂學問所)，將其餘二校改稱大學南校、大學東校，隨後改稱東京開成學校、東京醫學校。兩校在 1877 年合併創立為文部省管轄的官立東京大學。1886 年帝國大學令公布後，東京大學與工部大學校合併成立帝國大學，1897 年第二所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成立後，方改稱東京帝國大學。明治前期東京帝國大學相關學校主導當時日本高等教育，各學科成立了諸多學術協會，而在此高等教育與學術體制建置過程中，渡邊洪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參見大久保利謙，《日本の大学》(東京：創元社，1943)。瀧井一博，《渡邊洪基：衆智を集むるを第一とす》(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

都兼及於鄰近滿洲的朝鮮或西伯利亞地域。

其次，東京大學地質科主導的地學會刊物《地學雜誌》，在成為東京地學協會機關刊物之前，主要內容係以日本本國的地質學調查知識為主。但在 1897 年成為東京地學協會機關刊物後，地學雜誌的海外調查報告明顯增加，尤其伴隨 1894 年甲午戰爭爆發、日本大陸政策展開，海外尤其朝鮮與滿洲的地志報告開始增加；而在日俄戰爭後，中國尤其滿洲地域的地學調查研究更是遽增，包括眾多的滿洲兵要地志調查資料；其後，隨著日本地學研究的顯著擴大，並伴隨日本海外貿易與地緣政治關切地域的擴張，該雜誌的海外調查才普遍擴及中國本部其他地區與世界各地。³⁴

透過兩刊物內容目錄的考察，可以發現如島弘毅、古川宣譽、榎本武揚、黑岡帶刀、梶山鼎介、福島安正、小泉正保(1855-1917)、大鳥圭介(1833-1911)、菊池節藏、曾根俊虎、長岡護美、神保小虎(1867-1924)等東京地學協會的重要參與者，都曾在東京地學協會例會活動報告其在滿洲等地的探險調查與旅行活動，並將報告刊載在協會報告中。而渡邊洪基也在第一年的《東京地學協會報告》中，連載了其譯自英國皇家海軍隨艦牧師洛伊德(Rev. W. V. Lloyd)隨軍艦調查俄羅斯在滿洲海岸各港口(新近取得的遠東濱海邊疆區如海參崴等港口)經營活動時所著考察報告；³⁵另如祖先為明朝遺臣流亡日本、而在明治初期擔任日本翻譯官

³⁴ 有關這兩個刊物內容的目錄主題，詳細參見前島郁雄編，《東京地学協会報告・地学雜誌総目録》(東京：東京地学協会，1981)。另有關《地學雜誌》的報導主題，參見以下分析，谷内達，〈地学雜誌の1世紀に見る海外調査研究の歩み，1889～1990年〉，《地学雜誌》，100：1(東京，1991)，頁 63-68。段偉、何滢，〈1889-1944 年日本《地學雜誌》刊載涉及中國論文分析〉，《地理研究》，32：3(北京，2013)，頁 580-589。

³⁵ 渡邊洪基翻譯之文標題為〈滿洲海岸魯西亞各港口〉，《東京地學協會報告》，1：8(東京，1879)，頁 1-11，原作者記為「露國ウユエフロイド著」，

與外交官的鄭永寧(1829–1897)，也連載了其譯自清朝文獻的黑龍江重要方志《龍江紀略》。此外，中山克己、神戶應一、肝付兼行、加藤增雄(1853–1922)、神保小虎、鈴木於兔平等人，亦發表了大量有關滿洲鄰近的西伯利亞東南部及海參崴等地的調查報告或者翻譯資料。而這些情報，都成為日俄戰前日本帝國滿洲兵要地志的重要參考資料。³⁶

四、明治前期亞細亞主義團體的滿洲兵要地志生產

接著，分析與滿洲地志等學知生產密切相關的日本亞細亞主義團體。日本明治維新後對清朝中國的關心日切，許多人抱持大陸(擴張)政策的膨脹野心試圖侵略中國，但也有部分人士基於東亞同文的傳統，擬與清朝提攜共同抵抗西方帝國主義，持有這兩種立場的人都有了解中國問題並與清朝多加交流的想法，因此開始組成各種亞細亞主義團體。這些團體大多以東亞同文親善為名，成員中有很多日本軍方與外交人員，同時也有大量民間身分人員。這些人中有真誠想與中國聯盟的亞細亞主義者，如積極協助孫中山(1866–1925)革命的宮崎滔天(1871–1922)兄弟等人；但成員中也有諸多主張日本東亞盟主論或者侵略中國的日本右翼國權派團體成員，如玄洋社的創始者頭山滿(1855–1944)與黑龍會的創始者內田良平(1874–1937)等人。

原文出處註記「龍動地學協會新聞第三十六卷所載」(即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ume 36)。不過，經查找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資料庫發現，該文原文為“Notes on the Russian Harbours on the Coast of Manchuria”，係出版於該刊物 1867 年第 37 卷、頁 212–231，另該文作者洛伊德並非渡邊洪基誤稱之露國(俄羅斯)人，其身份為英國皇家海軍隨艦牧師、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

³⁶ 以上兩刊物中滿洲地志調查相關資料，彙整自前島郁雄編，《東京地学協會報告・地学雜誌總目錄》。

明治前期日本陸續成立的亞細亞主義團體，主要包括至少在公開場合主張中日結盟對抗西方的振亞社(1878)、興亞會(1880[1883後轉變為亞細亞協會])、東邦協會(1890)、日清貿易研究所(1890)、東亞會(1898)、同文會(1898)、東亞同文會(1898[由東亞會、同文會及亞細亞協會合併而成])等團體；還有比較接近日本右翼團體的玄洋社(1881)，與作為其大陸政策施行團體所成立的黑龍會(1901)。³⁷

而分析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團體與大陸浪人在明治前期滿洲地志的調查與生產上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可從曾根俊虎、渡邊洪基、長岡護美等人的振亞社 / 興亞會與亞細亞協會、荒尾精(1858-1896)的日清貿易研究所及與其相關的東亞同文書院，以及頭山滿與內田良平等人的玄洋社、黑龍會與在滿洲的大陸浪人們，在明治前期與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期間的地志調查與情報活動上的作用來釐清。

(一) 曾根俊虎等人的振亞社、興亞會與亞細亞協會

曾根俊虎是米澤藩儒學者曾根敬一郎之子，少年時在藩校學習漢學，明治維新後在米澤向渡邊洪基學習英學，其後曾入慶應義塾向福澤諭吉、吉田賢輔(1838-1893)學習洋學，是身具新舊教養的時代之子。1871年曾根因牽涉暗殺事件遭到逮捕，經勝海舟(1823-1899)、副島種臣(1828-1905)、西鄉隆盛等人的援助，釋放後加入海軍，直到1891年因病退役為止共在海軍服役20年。

³⁷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翟新，《東亞同文會と中国》。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頭山滿等著，《アジア主義者たちの声〈上〉玄洋社と黒龍会、あるいは行動的アジア主義の原点》(東京：書肆心水，2008)。山室信一，《アジアびとの風姿》，頁119-124。各書中針對各亞細亞主義團體成立時間的說法有些不同，本文以狹間直樹一書說法為準。

曾根於 1872 年任海軍少尉，開始擔任外務卿副島種臣的隨員，陪同前往清朝協助日清修好條規與牡丹社事件交涉工作，此後直到 1884 年的十餘年間，多次被政府派遣至清朝從事外交與軍事情報偵察工作，在日本以「對支問題第一人」而聞名。曾根為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曾向出身北京，在日本教授中國語的知名教師張滋昉學習北京官話，其歸國後乃在 1878 年間與同志設立振亞社，倡議亞洲諸國合作振興亞洲，並在日本創設漢語學校。³⁸

1879 年間因伊犁事件俄羅斯進出亞洲，使得東亞事態緊張、中日之間也因琉球處分問題關係不睦，當時外務省官員渡邊洪基為了緩和日清關係、促進兩國貿易，乃在 1880 年聯合長岡護美、曾根俊虎、榎本武揚、岸田吟香(1833-1905)等人，暗中外務省經費支持，成立明治初期最重要的亞細亞主義團體——興亞會。由長岡護美擔任初代會長(後因其赴任荷蘭公使，改選出伊達宗城擔任會長)、渡邊洪基任副會長，並由曾根俊虎等人擔任幹事主導執行會務，其後再選出六名議員，包括桂太郎與伊集院兼良等陸軍參謀將校，此外重野安繹、三島毅(1831-1919)、中村正直(1832-1891)等諸多日本著名漢學者也是該團體重要參與者。

興亞會成立一個月後就有支持亞細亞主義的日本名士與學者共百餘名會員，一年後激增到三百餘人，會員中也包括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以及張滋昉(1839-1900)、王韜(1828-1897)等人，後並有朝鮮名士如金玉均(1851-1894)、徐光範(1859-1897)等加入參與活動。興亞會除東京本會外，也陸續在神戶、大阪、福岡等處設立分會。在東京本會的日本會員 155 人的職業種類，最多的是任職於外務省 28 人、海軍省 20 人、內務省 15 人，並有報業商人，以及陸軍與宮內省等其他政府機關職員。該會除舉辦各種亞細亞主義活動宣揚理念外，並陸續

³⁸ 以上有關曾根俊虎與振亞社，參見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頁 15-30。

在東京、大阪、神戶、熊本等地籌設支那語學校大力推動漢語教學，張滋昉即為東京興亞會附屬學校的漢語教師之一。該會也不時舉辦漢詩酬酢會，更編輯發行會誌《興亞會報告》等刊物。³⁹

1882年12月間，會長長岡護美等人提議將興亞會改名為亞細亞協會，大會仍選出長岡護美為會長、渡邊洪基為副會長，日中韓會員大致一仍其舊，會誌並改名為《亞細亞協會報告》。值得注意的是《興亞會報告》時期，為促進東亞各國會員的訊息溝通與交流，已經在日文為主的報告中加入東亞同文，即漢文報告內容，而在1883年初發行的《亞細亞協會報告》中更進一步擴大漢文報告內容。另外《興亞會報告》提倡中日合作時，已經提到中日商業發展的必要性，而在《亞細亞協會報告》中更進一步主張合作的基礎在於往來與貿易，鼓勵推動東亞三國的文化交流與發展通商貿易，並建立近代化市場，如此方能共同對抗歐美國家。⁴⁰

思想史家狹間直樹在研究明治前期日本亞細亞主義時，曾針對明治前期日本興亞會、亞細亞協會、東邦協會、東亞會、同文會及東亞同文會等亞細亞主義團體進行深入分析，發現這些團體主要主張與中國合作共同振興亞洲對抗西方；並對於曾根俊虎、長岡護美、渡邊洪基、桂太郎、榎本武揚、鍋島直大、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1864-1923)、宮崎滔天、近衛篤磨(1863-1904)等人的亞細亞主義思想多所分析。狹間透過對這些團體與主導者的思想分析，強調明治前期的日本亞細亞主流思想乃鼓吹中日兩國應以對等關係結盟，以共同對抗西方；直到義和團事變發生後，日本亞細亞主義團體的對中思想乃轉向為東亞日本

39 以上有關興亞會討論，參見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頁31-60。

40 關於亞細亞協會與其報告，參見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頁61-75。黑木彬文、鱒澤彰夫解說，《興亞會報告·亞細亞協會報告 1-2卷》(東京：不二出版社，1993)。

盟主論，主張日本應在列強協調框架下，保全並領導中國對抗西方。⁴¹

但仔細考察陸海軍參謀機關及外交機關與這些亞細亞主義團體的密切關連，還有這些亞細亞主義團體成員對東京地學協會的深度參與，相關行動包括渡邊洪基、長岡護美、曾根俊虎等人的滿洲地志調查書寫、以及對日清軍事與外交交涉的綿密參與，可以發現在亞細亞主義主張背後，有不少成員乃是藉由參與這些團體活動學習漢學、結交人脈，並對中國包括滿洲等地進行兵要地志與外交情報的調查，藉以擴大對於中國，乃至全亞洲的認識，並生產日本對中國戰備與外交交涉所需的學知。

(二) 荒尾精等人的日清貿易研究所與東亞同文會

接著，討論荒尾精及與其相關的亞細亞主義團體和活動。荒尾精，鹿兒島人，青年時期受到西鄉隆盛等人征韓論的刺激，而有雄飛海外並經綸東亞，日本國族主義與亞細亞主義兼具之強烈意識。他原本就讀東京外國語學校，後來決意「退學從軍，學練兵術，兼習清朝事宜，以備他日之需」，乃轉入陸軍教導團就讀於炮兵科，畢業後被分派到大阪鎮臺部隊，其後被選入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進修。荒尾在陸軍士官學校在學期間受到東亞局勢變動影響，並與頭山滿等玄洋社人意氣相投，更堅定其西渡中國經略東亞的雄心。1883年士官學校畢業後在熊本師團服役期間，荒尾精主動與陸軍派往中國留學學習中國語歸國的御幡雅文(1859-1912)學習中文。⁴²

41 有關狹間對於日本亞細亞主義的定位與歷史分期，參見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頁1-14。

42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各機關為了培養調查與研究中國學知的人才，開始積極推動官派來華留學教育。御幡雅文是參謀本部為培養漢語翻譯人才創設的

另一方面，明治初期亞細亞主義活動日趨蓬勃，如中法戰爭期間小澤裕郎(1858-1901)、曾根俊虎、山口五郎、白井新太郎等第一代大陸浪人的大陸經營活動，或如曾任玄洋社社長的平岡浩太郎(1851-1906, 內田良平的叔父)1884年在上海開設東洋學館，以培養日本經營大陸人才的教育活動，都對荒尾精的東亞經略思想多所啟發。1885年荒尾精奉調參謀本部亞細亞支那科服勤，愈加積極規劃西渡中國的目標，除利用參謀本部圖書資料詳加研究中國地志外，更廣結有志東亞經略的同志，譬如日後繼承其理念並實際協助創辦東亞同文書院之根津一(1860-1927)。

直到1886年，荒尾精終成宿願，奉參謀本部命令第一次派遣來華，從事情報調查工作。他首先拜訪在上海開設販賣藥品書籍與雜貨商品的樂善堂主人岸田吟香，岸田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曾任日本隨軍記者來臺進行戰爭報導，1880年與榎本武揚、渡邊洪基等人建立興亞會。其認同日本須培養有志對華工作的人才，早在1884年就配合參謀本部的情報調查規劃，協助該部伊集院兼雄大尉開設漢口樂善堂。荒尾的入華任務就是要接續經營伊集院的漢口樂善堂，岸田與他意氣相投，乃積極助其在漢口樂善堂以商人身分從事調查工作。

荒尾因此在參謀本部的命令與資金，及亞細亞主義者岸田吟香協助下，以樂善堂為基地，吸納與組織宗方小太郎、山內巖、井深彥三郎、高橋謙、浦敬一(1860-1889)、山崎恙二郎、藤島武彥、石川伍一(1866-1894)、北御門松二郎、河原角次郎、中西正樹等年輕大陸浪人，分別

「清國語學生」留學制度下，派遣來華的第一代留學生，參見譚皓，《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193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97-109。他後來參與了亞細亞主義團體在中國開設的日清貿易研究所與東亞同文書院的中國語教學事業，並編寫了流行的中國語學習教材《華語跬步》，是明治時期最重要的日本中國語教育家之一。參見石田卓生，《東亞同文書院の教育に関する多面的研究》(東京：不二出版，2019)，頁331-350。

在中國各地進行情報蒐集工作，並在 1889 年結束派遣任務後向參謀本部提交復命書。在復命書中，他強調對於清朝若僅採外交親和或者攻伐的政策，都無法協助其振興並有助於日本抵禦西方的亞細亞主義目標，主張應該設立「日清貿易商會」以促進對清貿易，抵抗西歐諸國對於東亞的經濟侵略，並透過日清經濟合作，共謀富強以達成東亞防衛目標。荒尾精歸國復命後不久，開始在日本各地遊說，爭取贊助以實踐設立日清貿易商會的計劃，並遊說、募集願意一起前往中國，進入商會附屬日清貿易研究所就學的年輕人。

1890 年 9 月，經過辛苦奔走，獲得政界人士以及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1848-1899)提供內閣機密費的協助，並募集 150 名學生與研究所職員合計 200 名，從橫濱出發共同前往上海，開設近代日本第一個大型在華民間教育機關——日清貿易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初期的經營雖面臨財政不足與學生水土不服受疫病所苦，計劃主體的日清貿易商會也遲遲無法設立，但逐步克服困難，最終在 1893 年 6 月間有 89 名的學生在研究所持續學習並畢業，並由大阪商人岡崎榮三郎出資在上海開設日清商品陳列所，供畢業生留在上海進行商業實習。第一屆學生畢業後，荒尾精本想繼續推動研究所教育，並籌設大規模的東方通商協會推動實質的日清貿易活動，但因經費募集不順與甲午戰爭爆發，不得不關閉研究所，並將教職員與學生撤回日本。歸國後的荒尾精間接參與了甲午戰爭，並在戰後到上海與臺灣持續推動以促進日清貿易為主軸的亞細亞主義活動，但 1896 年在臺灣活動期間不幸感染鼠疫而結束其輝煌而短暫的一生。⁴³

⁴³ 上述有關荒尾精的生平與事業，參見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東京：東亞同文會，1936）。黃福慶，〈甲午戰前日本在華的諜報機構：論漢口樂善堂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臺北，1984），頁 305-331。陳豐祥，〈亞細亞主義與荒尾精〉。山室信一，《アジアび

本節之所以稍詳細敘述荒尾精這兩個似乎短暫的事業，乃是因其對於明治時期日本亞細亞主義發展、日本對中國情報偵察與滿洲地志生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荒尾所主導的漢口樂善堂匯集了前述宗方小太郎等明治前期來到中國浪遊的諸多「大陸志士」，這些人有的如荒尾一樣具有日本軍人等官方身分，有些則是出身於上海東洋學館、興亞會支那語學校或熊本濟濟齋等亞細亞主義團體所設學校的民間志士。他們在荒尾的組織下奔走各地，從事兵要情報與經濟調查等狹義與廣義的中國地志調查事業。這些人透過與中國各階層包括重要官員、文人及豪強交往，以調查情報、建立親善關係、培養在地人脈或干預軍事與政經事務的方式，成為其後日本大陸浪人在中國活動的原型。而這些人除了部分在調查壯遊過程犧牲罹難，其餘很多人如宗方小太郎等則陸續成為重要的亞細亞主義者，長期在中國或日本進行各種亞細亞主義活動。

其次，荒尾進一步組織的日清貿易研究所，則以荒尾精的友人如根津一、木下賢良、御幡雅文等人，與前述提到的宗方小太郎等漢口樂善堂重要成員作為主要教職員主導教學，並募集了大量有亞細亞主義思想的日本年輕人入學，包括一些曾在興亞會支那語學校、熊本濟濟齋等處學習漢語的青年人。這個研究所透過人才在上海的匯聚與教學實習的過程，大量培養了新一代具有大陸經驗與熱情的亞細亞主義者，並在這些人之間確立起緊密的亞細亞主義思想與人脈紐帶。日清貿易研究所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成果，是將荒尾精等人在中國的實地調查資料，由根津一等人編輯出版了《清國通商綜覽》這一套共 2,800 餘頁，有關中國商業活動的百科事典。

前面提到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清貿易研究所關閉，師生被迫歸國。

との風姿》，頁 240–254。

而在戰爭期間，荒尾精主要隱居在京都，撰寫〈對支意見〉、〈對清辨妄〉等對中國的政策意見書，而他在漢口樂善堂的知交舊識與日清貿易研究所的教職員如根津一、宗方小太郎等共 19 人，還有研究所畢業學生共 72 人，則在他的鼓勵推薦或軍方的邀請下，大量投入遼東戰地擔任通譯，並協助在滿洲等地對中國的兵要情報調查與間諜工作。應注意的是，在明治前期日本的漢文教育傳統雖仍有一定的延續，但除了文言漢文的閱讀外，具有實際漢語口說能力，能夠進行通譯或者地志調查能力的人才很少，這些人的投入可以說對日本在甲午戰爭的勝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⁴⁴

其三，荒尾精在 1896 年早逝，但漢口樂善堂與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各種亞細亞主義事業，仍由前述兩個團體的成員們所承繼並擴大。除了個別的活動與發展外，這些成員共同參與甲午戰後 1898 年日本最重要的亞細亞團體「東亞同文會」的成立，該會並在 1900 年委任根津一在南京籌設成立同文書院(同年因義和團運動遷到上海，隔年改稱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會在日本的活動雖主要由東亞會、同文會與亞細亞協會成員、而未必是前述荒尾精兩個事業直接相關人員所主導，但該會活動主體乃是在上海、漢口、北京、福州、廣東等中國各地支部的教育與新聞報刊活動，而這些中國事業的活動主事者幾乎都是根津一、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樹、高橋謙等荒尾精事業人脈的重要成員。

⁴⁴ 有關漢口樂善堂與日清貿易研究所教職員與學生的出身與人脈關係，參見佐々博雄，〈日清戦争後における大陸「志士」集團の活動について：熊本国権党系集團を中心として〉，《国士館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27(東京，1994)：45-61。有關這些人在甲午戰爭的投入與活動，包括在戰爭中的殉難，參見葛生能久編，《東亞先覺志士記伝 上卷》(東京：黒竜会出版部，1934)，頁 426-501。佐々博雄，〈日清戦争と通訳官〉，收入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 下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頁 371-399。

簡要來說，東亞同文會的主要意義，是在漢口樂善堂與日清貿易研究所的事業與人脈的基礎上，進一步集結了明治時期日本政府與民間的資源與人力，擴大推動了四個互有關連的亞細亞主義工作。首先是透過經營與清朝官方及民間要人的關係，推動日中親善活動並偵查及干涉中國的政治與軍事活動；其次，透過東亞同文書院等教育活動的大規模展開，培養了日本新一代的亞細亞主義者，投入日本行政機關並參與對中政策的擬定執行，或者加入關東都督府、滿鐵等殖民機關參與滿洲殖民統治；其三，東亞同文書院也招收中國學生，進一步培養中國在地的日中親善勢力，擴大了日本亞細亞主義團體與在地社會的各種政經文化連結；其四，透過參謀本部的斡旋，由外務省提供補助下，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每年進行中國各地的調查旅行，並延續前述《清國通商綜覽》一書的出版，將這些調查旅行成果彙整編輯，陸續出版《支那經濟全書》、《支那省別全誌》等以中國作為經營空間所需的地志學知。這些出版物不僅為日本各界，且是其後中國各界認識與研究中國所需的重要學知來源。⁴⁵

(三) 頭山滿與內田良平等人的玄洋社與黑龍會

以下接續探討玄洋社、黑龍會等偏向日本國權主義並帶有侵略性的亞細亞主義活動。玄洋社的創立者頭山滿、平岡浩太郎早期都受到

⁴⁵ 東亞同文書院在 1901–1906 年間的調查活動主要以北京和天津為主，但 1907 年取得外務省補助後，調查活動範圍開始擴及包括滿洲在內的中國各地。前述東亞同文書院的發展參見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創立八十周年記念誌》（東京：滬友會，1982）。滬友會監修，《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實錄中國踏查記》（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1）。藤田佳久，《東亞同文書院中國大調查旅行の研究》（東京：大明堂，2000）。翟新，《東亞同文會と中国》。

西鄉隆盛的征韓論很大的影響，從而產生對外經略亞洲的亞細亞主義思想，乃在 1881 年成立玄洋社，主張必須對抗西方帝國主義以保衛國權，並支持亞洲各國獨立，以聯合對抗西方殖民主義。與前述興亞會等其他亞細亞主義團體主要關注中國的發展(少部分也關心朝鮮發展)有所不同的是，1880 年代俄羅斯在東北亞的勢力開始擴張，尤其甲午戰後聯合德法兩國強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一事，對於頭山滿等玄洋社成員產生強烈的衝擊。玄洋社年輕成員內田良平乃在頭山滿等人支持下，在 1901 年另行成立黑龍會，作為玄洋社在亞洲大陸的行動機關，積極支持、參與孫文等清朝革命派的活動；另一方面也廣泛介紹俄羅斯在東北亞的擴張，並在 1903 年組成「對露同志會」，在日本社會積極宣揚並主張應對俄羅斯開戰。

黑龍會主導者內田良平曾在 1893 年入學東洋語學校學習俄語，並在 1897 年嘗試橫越西伯利亞，對於俄羅斯在東亞的擴張有深入認識，他在 1898 年就開始在東亞同文會的雜誌《東亞時論》上發表有關俄羅斯的主張。在他的主導下，黑龍會在 1901 年出版《黑龍》雜誌，自我標榜是研究俄羅斯、朝鮮、滿洲情勢獨步天下的第一大雜誌，並陸續出版了《最新滿州圖 附・交通解説》(1901 年 4 月)、《露西亞論》(1901 年 11 月)、《露國東方經營部面全圖》(1902 年 5 月)、《對露の危機》(1903 年 6 月)等有關俄羅斯的滿洲擴張地圖、滿洲交通地志的解說，與主張對俄宣戰等書籍圖志。而在 1904 年 2 月日俄宣戰後的戰爭期間，又立刻出版《征露案内》(1904 年 2 月)、《北征必携夏の滿洲》(1904 年 4 月)、《堪察加薩哈噠 附・痾哥斯科沿岸》(1904 年 9 月)等書籍，向出征滿洲的軍士與國民提供有關滿洲征伐必須具備的天氣交通情報與重要地志資訊。⁴⁶

⁴⁶ 前述黑龍會的組織與出版品發展，參見黑竜会編、伊東正基等著，《最新滿洲圖 附・交通解説》(東京：黑竜会，1901)。內田甲(內田良平)，《露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向軍方與國民提供俄羅斯在東北擴張的地志情報外，甲午戰爭期間玄洋社曾經派遣包括內田良平在內的 10 餘名日本浪人組成天祐俠團體，潛入朝鮮聯繫與支援東學黨，試圖促成有助於日本控制朝鮮政局的局面。而在日俄戰爭期間，玄洋社也曾在滿洲軍總司令部參謀福島安正的指揮下，派遣日本浪人協助動員滿洲在地的馬賊(如馮德麟[1867-1926]的集團)組織滿洲義軍，進行兵要地志偵查的間諜活動，並在俄羅斯軍隊後方擾亂，進行鐵道破壞與物資掠奪。⁴⁷

在此有必要附帶討論福島安正這位重要陸軍參謀將校的生平，其少年時進入江戶幕府講武所學習洋式兵學，並參加戊辰戰爭。明治初期，進入開成學校學習外國語，1874 年 9 月從司法省文官轉到陸軍省，1879 年 12 月調為參謀本部管西局員，前往中國、朝鮮進行地志與情報調查。同年 6 月，任駐清朝公使館附屬官。1884 年 11 月就任參謀本部管西局員兼傳令使。1885 年 2 月至 4 月以《天津條約》交涉隨員身分陪同出席談判。後在日本陸軍大學，跟隨從德國來日擔任教官並兼任參謀本部顧問的雅各布·梅克爾少校(Jakob Meckel, 1842-1906)學習。1886 年前往印度、緬甸方面視察，其後升任少佐並轉任柏林大使館武官，負責調查俄羅斯西伯利亞鐵道建設情形；1892 年從德國歸國時，單人騎馬冒險，從波

西亞論》(東京：黑竜会，1901)。內田良平，《露國東方經營部面全圖》(東京：黑竜会，1902)。葛生修吉編，《對露の危機》(東京：黑竜会海外本部，1903)。黑竜会編，《征露案内》(東京：溥天堂，1904)。黑竜会編，《北征必携夏の滿洲》(東京：軍人忠死慰靈会，1904)。內田良平編，《堪察加薩哈連附·痾哥斯科沿岸》(東京：黑竜会，1904)。

⁴⁷ 有關日俄戰前日本利用東北馬賊協助從事情報調查與抗擊俄軍的議題，參見長谷川伶，〈研究余滴 日露戦争と戦場の諜報戦：「発信原稿 滿洲軍參謀部諜報部」の再発見〉，《軍事史学》，42：2(東京，2006)，頁 118-141。潘德昌、李月明，〈遼西馬賊與日俄戰爭〉，《日本問題研究》，2017：3(錦州，2017)，頁 59-63。

蘭開始，進行橫貫西伯利亞與滿洲之旅，行程約 18,000 公里，歷時 1 年 4 個月對當地實地調查，並將報告提交參謀本部。

值得注意的是，福島安正探險歸國後，立刻到皇居向天皇上奏旅行完成之事，亞細亞主義重要團體東邦協會並為其舉辦歡迎會，由該會評議員，時任海軍水路部長肝付兼行前往橫濱迎接，會場設於上野公園，由會長副島種臣伯爵致以祝辭，日本各報也詳細報導其探險事蹟。其後，福島也到東京地學協會進行公開講演，並將其探險紀錄《亞細亞大陸單騎遠征記》在《東京地學協會報告》長期連載，其後也將該書出版，吸引日本各界對於亞洲地理探險的輿論熱潮。

1894 年 8 月甲午戰爭期間，福島任日本第一軍參謀。1895 年 9 月任參謀本部編纂課長，進行歐亞旅行。歷任參謀本部第 3 部長、同第 2 部長。1900 年 6 月任日軍臨時派遣隊司令官在中國鎮壓庚子拳亂。同年 9 月至翌年 6 月擔任北清連合軍總司令官幕僚，在作戰會議上擔任司儀，以英語、德語、法語、俄語、中國北京官話進行調停。1902 年 5 月至 11 月，出使英國。1904 年就任日軍大本營參謀。同年 6 月任日俄戰爭中的滿洲軍總司令部參謀，負責諜報部門。其在各亞細亞主義團體的日本大陸浪人仲介協助下，統合滿洲清朝人馬賊組成「遼西特別任務班」，並任「滿洲義軍」總指揮。⁴⁸

⁴⁸ 有關福島安正生平履歷，參見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 第 2 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2005），頁 135。篠原昌人，《陸軍大將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東京：芙蓉書房，2002），頁 141-162。另有關其在東邦協會的演講與歡迎會，參見朝井佐智子，〈日清戦争開戦前夜の東邦協会：設立から 1894(明治 27)年 7 月までの活動を通して〉（愛知：愛知淑徳大学現代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13），頁 29-31。

(四) 日俄戰前清朝對於日本情報蒐集的暗中協力

本節最後，分析日俄戰前日本如何與清朝暗中結盟，而能在戰爭期間取得清朝在情報、物資與人員，如馬賊聯繫上的協助。甲午戰後李鴻章主導了清朝與俄羅斯的結盟，試圖壓制日本對於清帝國的威脅，然而1900年俄羅斯趁義和團之亂期間出兵東北，在該地實行軍事占領，1901年7月《辛丑條約》簽訂各國退兵後仍拒絕撤兵，清朝中央乃轉為聯日制俄。而在清朝與俄羅斯交涉期間，日本因擔憂俄羅斯在東北久佔不退，威脅其在朝鮮的權益，積極協助清朝對俄談判，在日本強力介入並協調各國干涉下，1902年4月俄羅斯終於同意簽訂《歸還東三省條約》。但1903年4月約定到期後，俄羅斯仍拒不撤兵，在背後協助清朝抗議無效下，日本乃在1903年7月直接介入與俄羅斯交涉並積極備戰，最終談判無效，因此在1904年2月發動日俄戰爭。⁴⁹

面對一觸即發的日俄戰爭，清朝無力阻止兩國在自己的東北國土上動武，八國聯軍亂後的清朝也無力與日本軍事結盟，真正介入戰爭，因此採取局外中立的政策，但暗中在情報、物資補給運輸與聯絡馬賊方面支援日本。而就本文所關切的兵要地志情報的調查方面，早在日俄戰前1902年2月，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田村怡與造(1854-1903)到中國遊歷，拜會直隸總督袁世凱(1859-1916)期間，就已與清朝達成秘密協議，共同監視俄國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同年6月，日本煙臺領事館的陸軍武官守田利遠(1863-1936)就與袁世凱的軍事顧問立花小一郎(1861-1929)、公使館武官梶川重太郎(1864-1902)一起拜訪了袁世凱，⁵⁰雙方共同約定

49 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頁1-56。

50 守田利遠，福岡人，1886年陸軍士官學校畢業，1895年1月到1896年6

對俄情報活動，將在東北與山東負責情報偵察的清軍將校派遣給守田利遠統一指揮，由守田利遠彙整所有情報後，報告給日本和袁世凱。另應注意的是，日俄戰前與戰時日本方面統整軍事情報的，正是前述先後擔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與滿洲軍總司令部參謀的福島安正。

依照這一約定，這個日中共同合作，負責偵查俄軍情報並破壞俄軍設施的特別任務班成員合計 47 名，包括日本軍人與一些大陸浪人，中方人員則包括袁世凱從北洋軍中抽調而來的精幹人員，包括後來成為直系軍閥的吳佩孚(1874-1939)等人。吳佩孚在 1904 年 5 月間剛從保定速成學堂測繪科畢業後不久，就與其他特別班成員接受守田利遠指揮，派往東北各地偵查軍事情報。他在當年 12 月間曾遭俄軍捕獲並判處死刑，幸運逃脫後仍任日軍第一線情報員，戰爭結束後與特別班成員都曾獲日皇贈勳表彰其軍功。⁵¹

在此應特別提到的是，日俄戰爭期間日中的軍事合作不僅奠基於前述參謀本部設立的駐外武官情報制度，還與甲午戰爭後清朝為了推動軍事近代化，指派袁世凱建設新式陸軍有關。從淮軍中起家的袁世凱等人，最初主要援用德國顧問與模式建設新軍，但隨著甲午戰爭後開始興起對日本明治維新的仿效與日本留學熱，日本也藉機向清朝中

月甲午戰爭期間出征。1896 年 5 月在參謀本部任職，1897 年 10 月到 1900 年 10 月期間被派遣到清朝處理義和團之亂。1900 年 10 月再度任職參謀本部，1902 年 5 月開始駐紮在山東芝罘從事情報收集任務。1904 年 12 月因日俄戰爭軍功獲滿洲軍總司令官大山巖授予個人感謝狀。參見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 第 2 版》，頁 158。

⁵¹ 前述日俄戰爭前後清日兩國的軍事合作，以及吳佩孚為日軍所做的情報行動，參見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頁 57-85。趙恆惕等編，《吳佩孚先生集》（臺北：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1960），頁 241。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方面針對俄羅斯與清朝在滿洲的完整情報活動，參見佐藤守男，《情報戦争と參謀本部》，頁 105-266。

央與地方要人推銷日本的軍事學知，希望協助建設新式陸軍。1898 年左右，日本開始獲得袁世凱與張之洞(1837-1909)等中央大員與地方督撫的支持，大量派遣日本軍人至清朝各地軍事學堂擔任教習，並推薦日本軍人為袁世凱等要人擔任軍事顧問。而在這個同床異夢的合作過程，袁世凱等人透過推動新軍建設掌握軍權，並在清朝政壇崛起，而日本軍方則逐漸取代甲午戰前的英國與德國成為清朝最重要的軍事合作國家，並與清朝要人建構親善關係，干預清朝軍事與政治發展，同時也得以建立有效的管道探查清朝的國情。⁵²

五、日俄戰前各類滿洲兵要地志的學知生產分析

接著，討論日俄戰爭之前各類滿洲地志文本的生產過程與其內涵，將分成兩類文本進行學知生產的分析，第一類是滿洲地志、兵要地圖與兵備志資料，第二類是海洋水路志資料。

(一) 《滿洲地誌》、兵要地圖與兵備誌等之學知分析

前面提到 1889 年日本參謀本部編輯的《滿洲地誌》(《中國地誌 卷 15 上》)，該書原先僅是日本參謀本部內部出版流通的文書，但在 1894

⁵² 有關晚清中國軍事改革中日本軍事顧問以及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畢業生扮演的角色，參見彭賀超，〈清末新政伊始地方督撫編練新軍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1(臺北，2016)，47-97。王鐵軍，《東北講武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3-62。李廷江，〈日本軍事顧問と張之洞—1898~1907〉，《アジア研究所紀要》，29(東京，2002)，頁 1-46。楊典錕，〈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軍事顧問・教官並びに特務機関の研究(一八九八~一九四五)〉，頁 1-82。蘇聖雄，《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3)，頁 19-96。

年 7 月日本帝國發動甲午戰爭後，參謀本部乃在 11 月間委由民間出版社公開發行此書。⁵³在這套書的凡例提到，其編纂過程參考、引用了不下數十部的書籍，但因書籍性質跟日本或歐美人的紀行報告不一樣，所以不一一揭載書名。而中國各地的幅員與人口主要依據 1882 年英國人金氏出版的《亞細亞全志》，並加以斟酌修改。土地山河等名稱，則主要依據《大清一統志》；地志與所附的中國地圖提到的經度，係以英國綠林子午線為零度。此外，內文中各地的歲出入資料，都是以以前的舊資料未必正確，另附加上最近歐洲人調查的資料作為參考。

《滿洲地誌》一書，係由陸軍屬下村修介與木下賢良所編纂。⁵⁴這部書僅一冊計 485 頁，共包括 18 章，分別是：位置(分界/廣袤)、山脈、江河、湖澤、海岸(島嶼/港灣/半島/岬角)、氣候、物產(礦物/植物/

53 參謀本部編，《滿洲地誌》(東京：博聞社，1894)。應注意的是，公開發行後的該書緒言指出：「滿洲是清國創業之地，稱為東三省，是中國東部的藩屏，人口有八百萬，**言語風俗實際上和中國本部並無差異**。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情況最近因跟俄羅斯領土接壤，因此成為中國政府在兵備與殖民上花巨資大力經營之地。而現在因為帝國軍事緊急，了解該地的山川風土、人情物產一切是最為緊要之事，因此乃翻刻此書發給眾人參考」。相比於日俄戰爭後百島庫吉等第一代滿蒙歷史地理研究者，開始強調滿蒙與中國本土之間在歷史、地理、民族與文化上的分離與差異，這本明治前期的滿洲地志還未刻意強調此點。引文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54 下村修介，山口縣人，1875 年 2 月以陸軍省出身的身分擔任初代清朝公使館附屬武官陸軍大佐福原和勝的隨員，同到北京赴任，主要從事清朝國內的地理文獻調查。歸國後到參謀本部任職，1884 年參謀本部陸續編輯出版的全套《支那地誌》，即是由其規劃主編。木下賢良，江戶人，曾在二松學舍學習漢籍，成績優異被拔擢為塾頭，1880 年考上參謀本部第一回俄語留學生，至海參崴留學數年，曾跋涉西伯利亞製作地圖，回國後在參謀本部任職協助編輯《滿洲地誌》。1890 年，木下隨荒尾精前往上海擔任其創辦的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地理教師，日清戰爭時擔任通譯官隨軍出征，戰後到臺灣總督府任職，日俄戰爭時再度歸國隨軍出征滿洲。參見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 下卷》(東京：原書房，1968)，頁 597-598。

動物、風俗、政體、宗教、製造、貿易(輸出入)、區分(幅員/人口)、道路、電信、都府、陸軍、史略。我們可將這些章節再分成狹義的地志與廣義的地志，前者包括位置、山脈、江河、湖澤、海岸、氣候、道路與電信等，也就是「地理空間」知識；後者包括：物產、風俗、政體、宗教、製造、貿易、人口、道路、電信、都府、陸軍、史略，也就是在地理空間上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等「社會空間」知識。

從內容來看，這本地志的生產主要從清朝傳統的滿洲地志文獻，以及俄羅斯與英國學者編纂的近代滿洲地志文獻資料整理而來，另有部分則是得自明治前期少數日本人進入滿洲的實地踏查報告。其所參考的清朝滿洲地志是 17 世紀到 19 世紀中期以前傳統地志格式的文獻，如當時參謀本部陸軍文庫等機構所蒐羅收藏的《欽定滿洲源流考》、《盛京通志》、《大清一統志》等歷史地理志。⁵⁵而俄羅斯與英國的文獻主要都是晚近實地調查而來的成果，知識內容比較切合當時的現狀，且其知識呈現方式也更符合近代的地理學、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學知的格式。⁵⁶

⁵⁵《欽定滿洲源流考》，清阿桂、于敏中奉勅撰，乾隆四十三年(1778)修成共 20 卷，是清朝的滿洲地志。《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奉天府尹董秉忠奉勅纂修，其後多次改修，乾隆四十九年(1784)諭令阿桂增修，增纂為 130 卷，定名為《欽定盛京通志》，內容包括盛京地區的壇廟、宮殿、建置沿革、疆域形勢、山川、城池、關郵、津梁、田賦、戶口、職官、選舉、學校、兵防、聖制、京城、山陵等。《大清一統志》是清朝官方撰寫的全國地理總志，編纂工作從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一直延續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共完成三次修纂(1744 年、1784 年、1842 年)，其中道光年間穆彰阿等奉勅撰成的嘉慶朝三修一統志(修至 1819 年[嘉慶二十五年])共有 560 卷，滿洲地志部分在該書第 57-71 卷。

⁵⁶本書在地理與歷史的表述上，常以支那人稱與俄羅斯人(魯人)稱並列的方式展現，也常並列《大清一統志》與俄羅斯學者的說法。在《盛京通志》、《大清一統志》中，缺乏如經緯度、統計數字等力求精確的近代知識表述

其次，雖然在清朝《大清一統志》的表述內，疆界界線等有關帝國版圖範圍的內容也是敘述重點，但《滿洲地誌》的整體討論，對於疆界與界線的關注更為強烈且要求明確，體現近代空間學知所關切的主權邊界意涵。同時在全書中除了物產、礦物、製造與貿易等章節有關於社會經濟的討論外，其餘山脈江河等單純地理空間的表述也顯現編者對殖民發展的關切。且《滿洲地誌》一書除了在最後一章〈史略〉，詳細描繪了 19 世紀中後期清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以及原屬清朝的哪些滿洲地理空間主權因此歸為俄羅斯所有，也在相關章節中具體描繪了 19 世紀以來，俄羅斯在北滿等相關地區的殖民建設，顯現了近代學知呈現的實證性要求。

另一方面，《滿洲地誌》一書中也有許多重要學知，來自 1872 年以來日本陸軍的滿洲調查旅行者所撰寫的調查報告。依據目前的考察，本書至少參考了四份滿洲調查報告，第一份是前述受西鄉隆盛命令，1872-1873 年間來滿洲調查的陸軍少尉池上四郎(1842-1877)、武市正幹(1840-1874)及外務中錄彭城中平(1832-1874)等人的視察報告。池上四郎與武市正幹兩人是主要調查者，彭城中平是長崎唐通事六家之一彭城家的後裔，具備唐通事的素養，擔任兩人的通譯兼書記官，三人在滿洲調查期間也曾聘僱數名滿洲在地人。三人踏查地點包括奉天、海城、蓋平、牛莊(營口)等地，主要針對政治、兵備、人情、風俗、交通與經濟等議題進行調查。⁵⁷

第二份是陸軍步兵中尉島弘毅與一名不知名日本人(可能是通譯)在

方式，但在本書中這種近代實證的知識表述隨處可見。

⁵⁷ 池上四郎、武市正幹、彭城中平三人的傳記，參見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 下卷》，頁 40-46。三人中彭城中平的視察報告，參見黑龍會編，〈附錄 第 2 章滿洲視察復命書〉，收入《西南記伝 上卷 1》(東京：黑龍會，1908)，頁 22-60。

1877年間半年多的滿洲調查報告，⁵⁸這份調查報告被收錄在同年由陸軍參謀部編輯的《滿洲紀行》叢書的乙號，共有 110 頁。島弘毅等人在滿洲遊歷路線如下：北京—玉田縣—永平府—山海關—錦州府—白旗堡—新民—奉天—懿路—開原—伊通—大水河—吉林—打牲烏拉—伯都訥—塔爾巴吟台—齊齊哈爾—呼蘭—拉林—寧古塔—吉林—昌圖—法庫—奉天—撫順—興京—遼陽—營口—十三山站，然後回程原路折返。

第三份報告是陸軍砲兵中尉玉井隴虎與擔任通譯的北京公使館館員在 1881 年兩個半月間的調查報告，⁵⁹該報告被收錄在《滿洲紀行》叢書的丁號，共有 306 頁。他們的旅行遊歷路線為：北京—永平府—山海關—中後所—寧遠州—錦州府—新民—奉天—遼陽—連山關—鳳凰城—九連城—安東縣—鴨綠江—大孤山—金州—旅順口—大連—蓋平縣—營口—煙台(芝罘府)—經陸路往北京。

第四份報告，陸軍步兵中尉菊地節藏(1856-1908)與擔任通譯的俄羅斯語學生小島泰次郎、木下賢良(即前述《滿洲地誌》編者)以及一位不知名日本人嚮導在 1885 年三個多月的調查報告，⁶⁰該報告也被收錄在《滿洲紀行》叢書甲號，共有 291 頁。其遊歷調查路線如下：ブラゴウエシチェンスク(俄羅斯領地，即海蘭泡)出發—黑龍江省愛琿—墨爾根—齊齊哈

58 島弘毅傳記，見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 下卷》，頁 121-125。

59 玉井隴虎傳記，見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 下卷》，頁 236。

60 菊地節藏，早年就學於陸軍兵學寮，畢業後進近衛聯隊，1881 年進入參謀本部，是日本第一位長期在俄國工作的陸軍將校，調查與撰寫了重要的西伯利亞地志資料。參見大植四郎編著，《明治過去帳：物故人名辭典》(東京：東京美術，1988)，頁 1099。小島泰次郎，1880 年東京外國語學校露語科畢業，為學習俄語曾在海參崴停留四年，回國後在陸軍省任職，擔任高級俄語通譯。參見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集，《20 世紀日本人名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2004)。

爾—呼蘭河域—松花江畔殖民地—三姓(依蘭府)城—牡丹江沿岸軍道—寧古塔城—俄(額)穆索站—吉林城—開原—鐵嶺—奉天—牛莊終點。⁶¹

接下來，討論滿洲兵要地圖的蒐集與測繪活動。戰前曾在陸地測量部任職的日本地圖史學者高木菊三郎，曾將戰前日本的外邦圖蒐集測繪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期是明治初到 1883 年左右的準備編纂時代，主要是蒐集、整理與複製朝鮮、中國及英、法、俄羅斯等國所製作的朝鮮與中國的東亞地圖，還有 1870 到 80 年代初前述陸軍派遣將校的簡單旅行測繪圖，這些測繪圖僅有連接主要都市的交通路線圖，其餘地方多為空白。

第二期是 1884 到 1917 年間的實測整備階段，並分前期與後期，1884 年從朝鮮半島開始進行點線式的實地秘密測繪，並擴及到清朝滿洲等地區進行零星地點測繪。而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陸軍測量部曾編成臨時測圖部，首次在朝鮮與滿洲南部戰區後方進行大規模測繪，從點線式轉變成面式的測繪，兩地的前線部隊也進行戰鬥用偵察圖的製作。甲午戰後因應日俄戰爭的爆發，陸軍測量人員加緊在朝鮮與滿洲地區進行秘密地圖測量，而在日俄戰爭期間則再度編成臨時測圖部，在戰區進行大規模測繪。戰爭結束後，日本取得南滿洲地區的殖民支配權益，因此臨時測圖部並未解散，而是持續在滿蒙部分地區公開或者秘密測繪地圖。第三期是 1918 之後的外國製(包括俄羅斯與中華民國)新式地圖入手整備階段，因非本文討論時限，在此不細論。⁶²

⁶¹ 根據安達將孝的考證，1889 年編纂供參謀本部內部參考名為《滿洲紀行》的叢書，共有四號，但目前未見丙號報告。有關這些報告的內容介紹，參見安達將孝，〈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軍事史學》，37：2/3(東京，2001)，頁 271-282。

⁶² 第三期始於 1918 年俄羅斯革命後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期，除了再次編成臨時測圖部實地測繪滿洲北部與西伯利亞地區外，並擄獲大量俄羅斯製作的東亞精密地圖，開始外國製地圖整備階段。其後因中國本身近代化測繪活

以本節所關切的第一期與第二期日本外邦圖整備的討論來說，小林茂的進一步研究指出，明治初期日韓關係緊張與臺灣出兵期間因應戰爭需要，日本透過英、法製成的近代東亞地圖與朝鮮、清朝製成的傳統東亞地圖之複製與編輯，製作了比例尺百萬分之一與七十萬分之一的東亞地圖；到了 1880 年代，透過少數陸軍將校如北京公使館武官梶山鼎介少佐等人在朝鮮與中國的地圖蒐集與零星測繪，首次編輯了二十萬分之一的朝鮮與清朝地圖，在甲午戰爭期間這些地圖被配發給朝鮮與滿洲的日本前線部隊使用，但其比例尺過小僅能作軍隊行進路線的指引，進一步的戰爭規劃必須配合實際的戰地地形偵察；其後，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及日俄戰爭時期，日本陸軍測量部組成了臨時測圖部展開戰時測量，方能完成五萬分之一與二萬分之一的較精確地形圖。⁶³

另外，從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陸地戰場空間情報的掌握與利用來看，除了前述攸關部隊交通後勤與戰線規劃的地志與地圖之外，還有三種類型的相關學知是重要的。首先，是完整調查與編纂地志時應優先探查的外國兵備資料，即描繪清朝戰備情報的《鄰邦兵備略》等兵要地志。日本參謀本部早在 1880 年就開始委任福島安正調查、編寫

動及航空測繪活動的展開，及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戰爭的擴張，日本帝國的實地測繪與外國製地圖入手又有重大變化。以上分期，參見高木菊三郎著，藤原彰編，《外邦兵要地圖整備誌》，〈第六章 括論〉，頁 317-322。

⁶³ 有關高木菊三郎的分期與討論，小林茂與其帶領的研究者們配合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外邦圖資料的發現與整理，以及陸軍外國派遣將校活動的相關史料，在高木等人的研究基礎上作出修正與深入分析，對於戰前日本外邦圖測繪的歷史過程與圖像提供了最為完整的理解。參見其編著三書，小林茂，《近代日本の地図作製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外邦図」へのアプローチ》。小林茂，《外邦図：帝国日本のアジア地図》。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海外地理情報収集と初期外邦図》。有關初期外邦圖的進一步研究，參見上述小林茂所編第三本書。

此類資料，並每隔幾年就根據最新資料整理改版。⁶⁴其次，是作為地志調查附屬成果的《滿洲沿道誌》(1900)等軍用手冊。這種配合地圖整理的資料，是根據派遣將校提供的滿洲紀行資料編寫而成，提供對戰略要道之路線、距離、地形等項目的認識，作為作戰部隊在行軍、駐軍與戰鬥上重要的指引。⁶⁵最後，則是根據兵要地志、整體國勢與國際關係下所擬定的對外戰爭方略，譬如日本在 1870 年代後期參謀本部組織與功能確立後，即不斷因應國際局勢的緊張，開始對各時期的可能戰爭防衛或者軍事征討擬定具體的戰略方案，如桂太郎擬定的《關清策案》(1879)、小川又次(1848-1909)《清國征討策案》(1887)等。⁶⁶

(二) 滿洲水路志之學知分析

接著，討論海軍相關部門滿洲水路與沿岸地志的出版整編活動。日本幕末以來開始聘僱外國顧問快速學習外國測量技術、購買歐美等國已經出版的海圖，並購置外國船艦與測量工具學習水路測繪，同時也學習英美等國的水路部組織、水路製圖的編整出版方法等，終於在 1881 年間開始展開獨立自主的國內外水路測量與出版作業。水路局在 1881 年開始規畫出版名為《寰瀛水路誌》全套 18 卷的國內外水路志，最初主要是翻譯與整理英國為主的國外出版水路志，並輔以陸續展開的自主測繪水路資料而持續增補與改版。但 1889 年水路部認為名稱

⁶⁴ 陸軍文庫編，《隣邦兵備略》(東京：參謀本部，1880)。有關該類資料的研究，參見安岡昭男，〈《鄰邦兵備略》と山景有朋〉，收入安岡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98)，頁 192-216。

⁶⁵ 參謀本部編，《滿洲沿道誌》(東京：參謀本部，1900)。

⁶⁶ 桂太郎，〈關清策案〉，收入桂太郎文書《故桂公傳記參考書》(三)(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山本四郎，《小川又次稿〈清國征討策案〉(1887)について》，《日本史研究》，75(京都，1964)，頁 100-109。

不適當，且原訂計畫過於龐大，因此改變計畫，決定僅以日本艦隊主要航行區域的東亞海圖作為調查整備出版對象，因此改變水路志名稱，改以日本、支那、朝鮮及露韓沿岸四種 11 卷的方式重新審訂出版。同時，1889 年日本水路部購置的測量艦開始服役，日本自主的水路測量效率也大幅提升。⁶⁷

本文所關切的中國東北滿洲沿岸的水路資料，先後整理在以下出版品中：《寰瀛水路誌第五卷》(海軍水路局，1881)、《支那海水路誌第一卷》(水路部，1890)、《支那海水路誌第一卷 第二版》(水路部，1899)。⁶⁸以 1899 年的《支那海水路誌第一卷 第二版》的資料為例，該卷內容主要翻譯自 1894 年英國水路部刊行的《支那海水路誌第三卷》中的第九編及第十編，另部分內容還加入 1891 年到 1898 年間日本軍艦在芝罘、白河、天津、遼河等黃海沿岸的水路測繪報告與紀錄。該卷內文各編章節包括：第一編：總記、條約港、天氣風候、大風、海流、潮、冰、浮標及立標式、飲料水、石炭貯藏場、船渠、通信、貨幣、秤量、諸航路；

⁶⁷ 參見水路部編，《水路部沿革史：明治 2-18 年》；水路部編《水路部沿革史：自明治 19 年至大正 15 年》。在水路志的出版資料中，皆具體載明出版資料來自於那些已出版或新報告的國外水路資料之翻譯，以及日本自身的補測資料，並告知讀者書中涵括的水路區域未測或者粗略測量地方很多，若有發現誤謬之處，或者有必須改補、重新實測之處，希望能夠向水路機關報告。另有關 1861 年東北營口(牛庄)開港後，英國海軍針對中國北方包括滿洲周邊水路志的調查與成果出版過程，參見游博清，〈英國海軍與中國北方沿海海洋地理資訊的建立及其相關作用(1861-1894)：以出版物為主的分析〉，《新史學》，32：2(臺北，2021)，頁 195-250。

⁶⁸ 此外，日俄戰爭前還有一些相關的滿洲水路資料，如水路部編，《日本、朝鮮、黑龍沿岸州及支那沿岸各地經緯度及潮信表》(東京：水路部，1891)、海軍參謀部編，《支那沿岸紀要第一、二卷》(東京：海軍參謀部，1891[補錄 1893])。日俄戰後滿洲沿岸陸續增補更新的水路資料，如水路部編，《支那海水路誌第一卷 第二改版》(東京：水路部，1905)；水路部編，《支那沿岸水路誌第三卷》(東京：水路部，1916)。

第二編：自揚子江至直隸海峽東海黃海、膠州灣、靖海灣、石島灣、榮城灣、山東高角、威海衛港、龍門港、芝罘港、登州錨地、廟島列島、候布澳、鴨綠江、大孤山、貔子窩、海洋島、外長山列島、大連灣、旅順港、老鐵山高角；第三編：直隸及遼東海灣、萊州灣、黃河、白河、天津青河、秦皇島、山海關、金州灣、復州灣、遼河、營口。

將這些日本滿洲方面的水路志，也就是滿洲海洋地志的生產過程與內涵，與前述陸地的滿洲地志生產相比，首先發現，日本近代海洋水路學知的建構過程跟陸地學知的建構非常相似，一開始都是先學習歐美的近代學知，透過聘僱外國專家、派人出國考察學習、學習外國組織架構來快速獲取西方的近代技術，從而得以在十餘年內達到技術自立與自主生產的階段。不過跟陸軍相關學知主要先學習法國而後轉向德國的模式不同，海洋學知的生產技術與知識主要學習英國，船艦儀器硬體設備也大多購自該國，並有部分組織學知學自新興的美國。

其次，滿洲水路志的生產跟滿洲地志一樣，最初是以翻譯、編輯自國外，尤其是英國已經生產的學知為主，但在得以獨立自主生產之後，就開始依照本國的需求進行補充實測與增添。不過，陸地地志跟海洋地志學知性質的不同，造成了滿洲陸地地志與海洋地志生產上的重大差異。如同前述的《滿洲地誌》一書，陸地空間的地志除了狹義的地理空間知識，還包括與人的社會活動密切相關、變動不拘且日益擴張的社會空間知識；而海洋地志的出版內容，雖然也包含跟人類活動相關的港口燈塔、埠頭等港口資訊，但主要都是跟航海安全相關的固定類型、不易變動的海洋地理空間知識。因此，19世紀晚期開始生產的近代滿洲陸地地志書籍，會隨著社會活動的調查與關注性質及範圍不斷擴增，書籍的份量、卷數越來越多。與此相對，滿洲沿岸水路的海洋地志雖然也不斷改版，但主要是固定類型水路知識的精確化與更新，書籍份量、卷數幾乎沒有什麼變動。

另一方面，知識類型的差異也造成陸地與海洋地志生產過程的影響。近代海洋空間的測繪活動雖然也跟國家主權相關，但晚清時中國對於海洋空間主權的維護還未展開，因此滿洲沿岸的水路測繪基本上不會面臨主權的掣肘；而且海洋地理空間知識的建構以自然科學為主，導致海洋地志知識只要是按照近代學知要求精確生產，就可以被普遍理解與國際通用。因此，日本帝國最初的國內外水路資訊，可以直接大量翻譯自晚清最主要的海洋強國英國所生產的學知，而僅需就本國航運與兵要戰略等需要特別關注區域，尤其是跟陸地地志相關的沿岸港口水路狀況，進行精確的補充調查。

與此相對，以前述滿洲地志的知識為例，自然科學性質的陸地地理空間知識，如地圖，雖然一經精確生產就可被普遍理解與通用，但這些類型的知識也都需要調查者能夠自由、安全地進入現場，並詳細調查方能建立，而其他屬於社會科學性質的社會空間知識則必須精通當地語言文化，並需要當地近代化行政體制的確立與配合方能建立與取得。因此，日本帝國滿洲陸地地志中的地理空間知識，雖然部分可以透過翻譯、複製英國與俄羅斯等外國調查情報而取得，但這些英俄調查者因無法自由、安全地進行全面調查，因此知識的精確性與涵蓋度都仍有所限制；而另外那些更為廣泛與複雜的社會空間知識，則因為外國調查者缺乏當地語言文化的認識，加上當地政府本身也未建立近代行政體制，因此其所提供各類社會空間資訊皆為有限推估，難稱全面與精確。

綜合這些原因，可以發現前述《滿洲地誌》一書中，滿洲各地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空間情報，其涵蓋範圍與精確度有限。在日本帝國仍未能擁有一定的主權進行全面近代化調查之前，僅能依賴歐美等國或清朝滿洲在地政權的情報，或透過少數軍事情報人員在有限調查取得相關情報。但除了少數可精確調查的地理面積等空間情

報外，很多複製他國或者自身探查所得的社會空間情報，其實連人口總數等基本資訊都不甚精確。⁶⁹

六、結論

本文主要關注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帝國，如何透過生產戰爭征伐所需的兵要地志，逐步將中國東北滿洲地區打造為其「帝國空間」。首先，筆者依序說明明治維新後，日本帝國如何藉由陸海軍參謀與水路機關等官方部門、東京地學協會等學術協會與民間亞細亞主義團體的情報調查與學知生產，從 1872 年開始持續生產有關滿洲的陸地與海洋兵要地志。藉由這些空間學知的有效匯集，日本帝國的近代化陸海軍不僅據以擬定了適當的戰略、戰術，而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陸續擊敗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並進而逐步推進其大陸擴張政策，陸續取得朝鮮與滿洲南部的支配權。⁷⁰

其次，過去學界有關日本帝國兵要地志的研究，大多著重於日本帝國從西方移植的近代空間學知在軍事調查與殖民地經營上的意義，較少關注亞細亞主義團體所主張的東亞同文傳統的重要性。本文則透

⁶⁹ 參見林文凱，〈近代化行政之根本：晚清民初(1905-1928)中國東北政權的警察保甲建置與人口調查〉，收入陳俊強、洪健榮編，《臺北州建州百年：在地化與國際化的視角》(新北：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新北市立圖書館，2021)，頁 161-204。

⁷⁰ 如同前言所提，日本帝國藉由滿洲兵要地志的學知協助，取得南滿洲的「問題空間」後，欲將其打造為更全面的日本帝國空間，還需將其轉化為穩固的「經營空間」。有關日本帝國如何透過關東都督府、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日本在滿洲各領事館等殖民機關進行各類詳盡的政治經濟調查，藉以生產推動殖民地近代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經營所需之社會空間學知，從而得以在九一八事變中成功擊敗東北在地奉系政權並成立「(偽)滿洲國」，並將滿洲全域納為日本帝國空間等議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過日本亞細亞主義團體在滿洲地志學知生產上的參與，說明東亞漢文與儒學的傳統，不僅在日本亞細亞主義團體日中親善的意識形態宣傳上具有重大作用，且在日中的人際交往互動與情報調查活動等面向，對於明治前期日本官方與民間的滿洲地志生產提供了重要的跨文化與人際連結基礎。⁷¹與此相關的是，本文也進一步指出滿洲地志包括地圖的生產過程中，清朝傳統滿洲地志與英國及俄羅斯的近代滿洲調查與學知，在日本帝國最初生產滿洲兵要地志時的重要借鑑意義。

其三，過去日本學界有關兵要地志的分析，因僅以日文史料為分析材料，主要關照日本帝國一方在空間學知生產上的主動角色，並未關注日俄戰爭前的日清外交交涉史、亦未參照中文史料，因此未曾詳細討論學知生產過程中，東北在地政權與馬賊等團體網絡協力之重要性。本文指出這些協力過程之所以能成立，與日本、中國各自的政策因素有關，一方面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團體或者荒尾精等人的活動方式，本來就以漢文的同文傳統為號召或者交往工具，而進行跨國的人際連結，並有助於日中親善合作活動的展開；另一方面，甲午戰後清

71 有關東亞同文傳統的重要性，僅需想像日本內藤湖南(1866-1934)、中國梁啟超(1873-1929)、朝鮮申采浩(1880-1936)、臺灣林獻堂(1881-1956)等人，相互間無法以口語流利溝通，但若有機會會面卻能透過漢文筆談溝通思想並共作漢詩共感，即可明白漢文傳統在明治前期東亞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有關東亞同文傳統作為意識形態與跨國交往工具，在日本帝國殖民地經營過程扮演的角色，日治時代臺灣文化史的諸多研究已做了深入的探討，參見如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入若林正文等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0)，頁 105-181。黃美娥，〈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台灣文學學報》，26(臺北，2015)，頁 1-37；黃美娥，〈帝國漢文的「南進」實踐與「南方」觀察：日人佐倉孫三的台、閩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4(臺北，2017)，頁 245-296。

朝雖對日本感到憤恨，但也同時被迫展開繼洋務運動後的另一波晚清新政，並因空間與文化親近性，選擇東亞同文傳統的鄰國日本作為近代化學知的繼受學習對象，因而大量引入日本軍事教習與顧問，同時主動協助東亞同文書院等日本文化機關在中國創設及運作。正因這些背後結構性因素的存在，方促成明治時期日本官民可獲得東北在地人士的協力，以生產滿洲學知。

另外，本文也檢討既有日本亞細亞主義相關研究，如前述狹間直樹雖在其研究中提到陸海軍與外交人員對亞細亞主義團體的參與，但傾向於根據曾根俊虎、長岡護美等人的公開文本言論，主張明治前期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主流思想乃是日清對等結盟共抗西方，直到義和團事變後方轉變為以日本為首領導中國改革，對抗西方的大陸擴張主義。但如上述對日本陸海軍參謀機關、東京地學協會與亞細亞主義三類團體在滿洲兵要地志生產的協力作用之分析，以及此三類團體在人員網絡上的重疊與密切網絡關係所示，早在甲午戰爭或義和團事變發生前，明治時期的亞細亞主義團體就與日本大陸擴張政策關係密切。其成員中除宮崎滔天等人的確無私協助清朝改革以臻富強，並期待日清結盟對抗西方外，許多主導成員係以亞細亞主義思想為口號，藉以經營與清朝官民間的親善關係，並透過亞細亞主義團體活動培植日本人才，協助探查中國的軍事、外交及政經情報，藉以謀求日本本國的利益，而在明治前期東北滿洲的兵要地志情報的調查更是重點所在。

此外，還應從東亞學知交流的角度，簡要討論晚清中國為了追求軍事近代化，如何學習日本帝國建構軍事學知與兵要地志的問題。首先，正如日本帝國係從歐美各國學習並移植近代學知，晚清以來掌控中央政權的北洋軍閥創立者袁世凱與東北奉系軍閥創立者張作霖的發跡過程，都與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擴張政策有密切關聯，且其背後也都體現了日本帝國軍事學知在中國的移植發展。袁、張兩人都依賴軍

事力量掌權，而兩人發展過程中都與日本帝國建立同床異夢的相互依賴關係，兩人與日本維持親善關係，並接受日本帝國派遣的軍事顧問與教習，讓自身成為日本帝國賴以維護其在中國或東北權益的重要協力者。另一方面，兩人也都透過這些日本帝國的軍事學知，有效推動自身軍隊的近代化，並藉以提升自己在中國的軍政勢力與地位。兩人最後也都因為不願完全屈服於日本步步進逼，而遭到日本背棄或者暗殺而死。⁷²

其次，有關滿洲地志相關學知的中日交流，還可從前述日本出版的滿洲地志在中國的翻譯或者閱讀運用來確認。前面提到在 1894 年甲午戰爭發生後，日本軍方為啟迪日本國民對於滿洲作為帝國空間的認識與欲望想像，將日本參謀本部 1889 年所編寫的第一本《滿洲地誌》，交由日本出版社公開發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中國也認識到這本地志書的出版價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在 1904 年將之翻譯出版，並在 1907 年再版，這顯然與日俄戰爭發生及晚清對於近代滿洲地志的學知認識需求高漲有所關聯。⁷³

最後，若進一步考察晚清以來滿洲兵要地志中的地圖生產，可以發現在中日長達數十年的學知移植與交流過程中，日俄戰爭以來的地

⁷² 有關袁世凱編練新軍以來，日本軍事學知包括參謀體制對於近代中國軍事近代化之長期影響，參見蘇聖雄，《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頁 41-167。水野明著，鄭樸生譯，《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內的軌跡》（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⁷³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滿洲地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商務印書館為宣傳販售該書所撰的廣告詞為：「日俄交戰實肇端於我滿東三省，滿洲一隅愈為世人注意之點，本館先印最新滿洲朝鮮地圖以備世人研究，惟有圖無志終嫌未便，昔人龍沙紀略、松漠紀聞等書皆嫌陳舊，茲覓得日本參謀本部近刊滿洲地志記載精詳調查明確，特譯印行世，以供留心時事者之參考。」參見商務印書館發行《東方雜誌》1905 年 2 卷 3 期所刊廣告頁〈商務印書館出版地理類〉（16 頁）《滿洲地志》條。

圖測繪生產實際上得到在地東北將軍、督撫的默認協助，並且測繪完成的地圖曾提供給其運用。另一方面，應進一步看到的是，東北三省在 1907 年開始積極推動軍事近代化，這個過程中日本的軍事學知與人員扮演要角，而就地圖測繪來說，實際上東北三省的陸軍測繪機關也主要都是學習日本帝國學知。陸續創設的吉林陸軍測繪學堂、奉天測繪學堂與統一東北三省測繪教育的東三省陸軍測繪學堂的主事者，剛好是前述與日軍約定，同意其在滿洲自身轄區內進行地圖測繪活動的三位將軍督撫，分別是 1907 年吉林將軍達桂、盛京將軍趙爾巽(1844-1927)，以及 1909 年東三省總督徐世昌(1855-1939)，他們都仿效 1898 年以來袁世凱等人引入日本陸軍教育制度與教習，推動軍事教育的做法，促成了東北地圖測繪教育的近代化。⁷⁴

(本文於 2025 年 7 月 31 日收稿；2026 年 2 月 12 日通過刊登)

*本文係國科會計畫「日本帝國滿洲地志、地方調查與中國東北地方志的比較」(MOST 109-2410-H-001-057-MY3)之成果。初稿宣讀於「第五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 變動世局中的臺灣：過去、現在與未來」(臺北：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辦，2025 年 5 月 21-23 日)。感謝與談人蘇聖雄教授及與會學者的評論。其後復經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謹致謝忱。惟文責仍應由筆者自負。

⁷⁴ 陳希，〈東三省陸軍測繪學堂研究(1909-1920)〉(瀋陽：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 13-19。王鐵軍，〈東北講武堂〉，頁 17-24、29-36。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 《東方雜誌》(上海)
ウユエフロイド著、渡辺洪基訳、〈滿洲海岸魯西亞各港口〉，《東京地學協會報告》，
1：8(東京，1879)，頁 1-11。
- 大井上義近，〈東京地学協會の沿革〉，《地学雜誌》，63(東京，1954)，頁 1-11。
- 大学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創立八十周年記念誌》，東京：滬友
会，1982。
- 不著作者，〈本會創立記事〉，《東京地學協會報告》，1：1(東京，1879)，頁 1-10。
-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東京：東亞同文会，1936。
- 内田甲(内田良平)，《露西亞論》，東京：黒竜会，1901。
- 内田良平，《露國東方經營部面全圖》，東京：黒竜会，1902。
- 内田良平編，《堪察加薩哈噠 附・痾哥斯科沿岸》，東京：黒竜会，1904。
- 日本地学史編纂委員會、東京地学協會，〈西洋地学の導入(明治元年～明治 24 年)その
1：「日本地学史」稿抄〉，《地学雜誌》，101：2(東京，1992)，頁 133-150。
- 日本地学史編纂委員會、東京地学協會，〈西洋地学の導入(明治元年～明治 24 年)その
2：「日本地学史」稿抄〉，《地学雜誌》，102：7(東京，1993)，頁 878-889。
- 日本地学史編纂委員會、東京地学協會，〈西洋地学の導入(明治元年～明治 24 年)その
3：「日本地学史」稿抄〉，《地学雜誌》，103：2(東京，1994)，頁 166-185。
- 水路部編，《支那沿岸水路誌第三卷》，東京：水路部，1916。
- 水路部編，《支那海水路誌第一卷 第二改版》，東京：水路部，1905。
- 水路部編，《支那海水路誌第一卷》，東京：水路部，1890。
- 水路部編，《支那海水路誌第一卷 第二版》，東京：水路部，1899。
- 水路部編，《日本、朝鮮、黒龍沿岸州及支那沿岸各地経緯度及潮信表》，東京：水路
部，1891。
- 水路部編，《水路部沿革史：自明治 19 年至大正 15 年》，東京：水路部，1935。
- 水路部編，《水路部沿革史：明治 2-18 年》，東京：水路部，1916。

- 石田龍次郎，〈東京地学協会編年史稿〉，《地学雜誌》，78：3(東京，1969)，頁 83-123。
- 石田龍次郎，〈東京地学協会編年史稿・補遺〉，《地学雜誌》，80：1(東京，1971)，頁 36-45。
- 村上勝彦，〈解説隣邦軍事密偵と兵要地誌〉，收入陸軍參謀本部編，《朝鮮地誌略》，東京：龍溪書舍，1981，頁 1-48。
-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 下卷》，東京：原書房，1968。
- 阿桂、于敏中等奉敕撰，《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1-5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前島郁雄編，《東京地学協会報告・地学雜誌総目録》，東京：東京地学協会，1981。
- 桂太郎，〈關清策案〉，收入桂太郎文書《故桂公傳記參考書》(三)，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 海軍水路局編，《寰瀛水路誌第五卷》，東京：海軍水路局，1881。
- 海軍省編，《海軍制度沿革 卷二》，東京：海軍大臣官房，1941。
- 海軍參謀部編，《支那沿岸紀要第一、二卷》，東京：海軍參謀部，1891(補錄 1893)。
- 高木菊三郎著，藤原彰編，《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
- 參謀本部編，《參謀本部歷史草案(一~三)：明治四年~十三年》，東京：參謀本部，1902。
- 參謀本部編，《滿洲地誌》，東京：博聞社，1894。
- 參謀本部編，《滿洲沿道誌》，東京：參謀本部，1900。
- 參謀本部編纂課編輯，參謀本部第二局校正，《支那地誌 卷 15 上 滿洲部》，東京：參謀本部。
- 陸地測量部編，《外邦測量史沿革草稿》，東京：陸地測量部，1939。
- 陸地測量部編，《陸地測量部沿革誌 第 1 至 5 編》，東京：陸地測量部，1922。
- 陸軍文庫編，《隣邦兵備略》，東京：參謀本部，1880。
- 黒木彬文、鱗澤彰夫解説，《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會報告 1-2 卷》，東京：不二出版社，1993。
- 黒竜会編，〈附録 第 2 章滿洲視察復命書〉，收入《西南記伝 上卷 1》(東京：黒竜会，1908)，頁 22-60。
- 黒竜会編，《北征必携夏の滿洲》，東京：軍人忠死慰靈会，1904。
- 黒竜会編，《征露案内》，東京：溥天堂，1904。

- 黒竜会編，伊東正基等著，《最新満洲図 附・交通解説》，東京：黒竜会，1901。
- 葛生修吉編，《対露の危機》，東京：黒竜会海外本部，1903。
- 葛生能久編，《東亜先覚志士記伝 上巻》，東京：黒竜会出版部，1934。
- 滬友会監修，《上海東亜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録：実録中国踏査記》，東京：新人物往来社，1991。
- 趙恆惕等編，《吳佩孚先生集》，臺北：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1960。
- 穆彰阿等奉敕撰，《(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五百六十卷》，收入《四部叢刊續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影印本。
- 頭山滿等著，《アジア主義者たちの声(上) 玄洋社と黒龍会、あるいは行動的アジア主義の原点》，東京：書肆心水，2008。
- Lloyd, W. V. "Notes on the Russian Harbours on the Coast of Manchuri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37 (1867):212-231.

二、近人論著

(一) 中文

- 土井正民著，張弛、何往譯，《日本近代地學思想史》，北京：地質出版社，1990。
- 山室信一著，徐興慶譯，《近代日本の東北亞區域秩序構想》，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2001。
-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滿洲地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
- 水野明著，鄭樑生譯，《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內的軌跡》，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 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
- 王鐵軍，《東北講武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安岡昭男著，胡連成譯，《明治前期日中關係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 佐藤三郎著，徐靖波、李建云譯，《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李齊芳，《中俄關係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 沈克尼，《侵華日軍兵要地志揭秘：100年來日本對中國的戰場調查》，北京：三聯書

- 店，2021。
- 和田春樹著，易愛華、張劍翻譯，《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 上下冊》，北京：三聯書店，2018。
- 岡本隆司著，陳彥含譯，《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7。
- 明驥編著，《中俄關係史 下冊》，臺北：三民書局，2006。
- 林文凱，〈近代化行政之根本：晚清民初(1905-1928)中國東北政權的警察保甲建置與人口調查〉，收入陳俊強、洪健榮編，《臺北州建州百年：在地化與國際化的視角》，新北：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新北市立圖書館，2021，頁 161-204。
- 林文凱，〈臺灣與東亞的帝國轉型：牡丹社事件與清帝國秩序的重振與瓦解〉，「牡丹社事件 150 週年國際講座交流會」，屏東：屏東縣政府主辦，2024 年 12 月 12 日。
- 段偉、何滢，〈1889-1944 年日本《地學雜誌》刊載涉及中國論文分析〉，《地理研究》32：3(北京：2013)，頁 580-589。
- 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 許金生，《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 1868-193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 陳希，〈東三省陸軍測繪學堂研究(1909-1920)〉，瀋陽：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2。
- 陳豐祥，〈亞細亞主義與荒尾精——甲午戰前日本大陸浪人的一個典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臺北，1994)，頁 227-265。
- 彭賀超，〈清末新政伊始地方督撫編練新軍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1(臺北，2016)，頁 47-97。
- 游博清，〈英國海軍與中國北方沿海海洋地理資訊的建立及其相關作用(1861-1894)，以出版物為主的分析〉，《新史學》，32：2(臺北，2021)，頁 195-250。
- 黃美娥，〈帝國漢文的「南進」實踐與「南方」觀察：日人佐倉孫三的台、閩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4(臺北，2017)，頁 245-296。
- 黃美娥，〈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台灣文學學報》，26(臺北，2015)，頁 1-37。
- 黃福慶，〈甲午戰前日本在華的諜報機構：論漢口樂善堂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臺北，1984)，頁 305-331。
-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入若林正丈等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0，頁 105-181。

- 潘德昌、李月明，〈遼西馬賊與日俄戰爭〉，《日本問題研究》，2017：3(錦州，2017)，頁 59-63。
- 譚皓，《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193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 蘇聖雄，《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3。

(二) 日文

- G. B. Sansom 著，金井圓等譯，《西歐世界と日本 下冊》，東京：筑摩書房，1966。
- 大久保利謙，《日本の大学》，東京：創元社，1943。
- 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參謀本部》，東京：中央公論社，1986。
- 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東京：立風書房，1998。
- 大植四郎編著，《明治過去帳：物故人名辞典》，東京：東京美術，1988。
- 大澤博明，《陸軍參謀川上操六：日清戦争の作戦指導者》，東京：吉川弘文館，2019。
- 小林茂，《外邦図：帝国日本のアジア地図》，東京：中央公論社，2011。
- 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地図作製と太平洋地域：「外邦図」へのアプローチ》，大阪：大阪大学出版會，2009。
- 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海外地理情報収集と初期外邦図》，大阪：大阪大学出版會，2017。
- 山本四郎，《小川又次稿〈清国征討策案〉(1887)について》，《日本史研究》，75(京都，1964)，頁 100-109。
- 山田朗，《世界史の中の日露戦争》，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
- 山室信一，〈文化相渉活動としての軍事調査と植民地経営〉，《人文学報》，91(京都，2004)，頁 227-249。
- 山室信一，〈空間アジアをめぐる認識の拡張と変容〉，收入青木保等編，《アジア新世紀 1 空間：アジアへの問い》，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 29-56。
- 山室信一，《アジアびとの風姿：環地方学の試み》，京都：人文書院，2017。
- 山室信一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八卷 空間形成と世界認識》，東京：岩波書店，2006。
-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集，《20 世紀日本人名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2004。
- 末廣昭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六卷 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

- 石田卓生，《東亜同文書院の教育に関する多面的研究》，東京：不二出版，2019。
- 石田龍次郎，《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地理学の成立》，東京：大明堂，1984。
- 安岡昭男，〈《鄰邦兵備略》と山県有朋〉，收入安岡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8，頁192-216。
- 安岡昭男，〈初期の東京地学協会と軍人〉，《政治経済史学》，400(東京，1999)，頁149-162。
- 安達将孝，〈参謀本部編『満州紀行』〉，《軍事史学》，37：2/3(東京，2001)，頁271-282。
- 佐々博雄，〈日清戦争と通訳官〉，收入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 下巻》，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頁371-399。
- 佐々博雄，〈日清戦争後における大陸「志士」集団の活動について：熊本国権党系集団を中心として〉，《国土館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27(東京，1994)，頁45-61。
- 佐藤守男，《情報戦争と参謀本部：日露戦争と辛亥革命》，東京：芙蓉書房，2011。
- 佐藤昌介，《洋学史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社，1980。
- 佐藤昌介，《洋学史論考》，京都：思文閣，1993。
- 李廷江，〈日本軍事顧問と張之洞—1898～1907〉，《アジア研究所紀要》，29(東京，2002)，頁1-46。
- 谷内達，〈地学雑誌の1世紀に見る海外調査研究の歩み，1889～1990年〉，《地学雑誌》，100：1(東京，1991)，頁63-68。
- 金井圓，《対外交渉史の研究：開国期の東西文化交流》，東京：有隣堂，1988。
- 長谷川伶，〈研究余滴 日露戦争と戦場の諜報戦：「発信原稿 満洲軍参謀部諜報部」の再発見〉，《軍事史学》，42：2(東京，2006)，頁118-141。
- 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 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 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創元社，1995。
- 梅溪昇，《お雇い外国人の研究 上、下巻》，東京：青史出版，2010。
- 朝井佐智子，〈日清戦争開戦前夜の東邦協会：設立から1894(明治27)年7月までの活動を通して〉，愛知：愛知淑徳大学現代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13。
- 楊典錕，〈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軍事顧問・教官並びに特務機関の研究(一八九八～一九四五)〉，東京：東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論文，2008。
- 源昌久，〈日本の兵要地誌に関する一研究：中国地域を中心に〉，收入小林茂編，

- 《近代日本の地図作製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外邦図」へのアプローチ》，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09，頁 256-298。
- 翟新，《東亜同文会と中国：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理念とその実践》，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会，2001。
- 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東京：亜紀書房，1997。
- 関誠，《日清開戦前夜における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明治前期の軍事情報活動と外交政策》，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
-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 篠原昌人，《陸軍大将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東京：芙蓉書房，2002。
- 瀧井一博，《渡邊洪基：衆智を集むるを第一とす》，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
- 藤田佳久，《東亜同文書院中国大調査旅行の研究》，東京：大明堂，2000。

Constructing “Imperial Space”: An Examina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s Manchurian Military Gazetteers (1872–1904)

Wen-kai Li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Under pressure from Western imperial power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was compelled to open its borders and launched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state. At the same time, it sought to emulate Western imperialism by advancing a continental policy aimed at expanding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in East Asia. Victory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n 1895 elevated Japan to the status of an East Asian empire. Confronted with Russian expansion into Manchuria, the Japanese Empire initiated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1904 and emerged victorious, thereby establishing its position as the core imperial power in East Asia. The principal theaters of both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were situated in the terrestrial and maritime spaces of southern Manchuria. Japan’s military victories were not only a result of its modernized army and navy, but were also closely linked to the spatial knowledge produced during the early Meiji period, specifically the military geographic intelligence concerning Manchuri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s Manchuria Gazetteers (*Manshū chishi*)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1872–1904), analyzing how Manchuria, as a “problematic space,” became the object of military gazetteer (*heiyō chishi*) production. This process laid the

spatial epistemic foundations necessary for warfare and gradually transformed Manchuria into a constructed “imperial spac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discussion proceeds in four parts. Firs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odern military reforms undertaken by the Japanese Empire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focus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staff institutions for the army and navy, as well as the system of military attachés abroad, and how these institutions facilitated the production of military geographic knowledge concerning regions such as Manchuria. Second, it analyzes the role of modern geographic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Tokyo Geographical Society. It explores how politicians, military officers, diplomats, and civilian scholars jointly construc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roles they played in the production of geographic intelligence, including the Manchuria Gazetteers. Third,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ontributions of early Meiji pan-Asian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members to the production of military geographic knowledge on Manchuria, as well a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patial intelligence investigations in wartime Manchuria during both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Finally,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of several key types of Manchuria Gazetteer material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rincipal methods and epistemic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spatial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Manchuria,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entangl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Japanese spatial knowledge and the corresponding epistemologi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Russian Empire.

Keywords: Manchuria Gazetteers, Spatial Knowledge, Intelligence Investigations, Tokyo Geographical Society, Pan-Asianism